



2020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中宣部2020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中宣部2020年优秀通俗理论读物出版工程项目

写给★ 青少年的★ 党史

邵维正 主编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刘晓宝 著



版社
GHOUSE



献礼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写给青少年的★ 党史

主 编
邵维正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 邵维正主编.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20.10
(写给青少年的党史)

ISBN 978-7-5552-9301-9

I . ①中… II . ①邵… III . ①中国共产党 - 党史 - 青少年读物
IV . ① D2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120118 号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或传播
本书的部分或全部内容。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书 名 写给青少年的党史·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丛书主编 邵维正
著 者 刘晓宝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532-68068091
策划编辑 谢蔚梁唯
项目统筹 刘克东
责任编辑 王龙华
封面绘图 董希文
装帧设计 乔峰 阅优文化
插图优化 乐道视觉
制 版 青岛乐喜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20年10月第1版 2021年3月第2次印刷
开 本 16开 (710mm × 1000mm)
印 张 12.25
字 数 22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9301-9
定 价 38.00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050

建议陈列类别: 青少年读物

《写给青少年的党史》丛书

编委会

总 顾 问 李 捷 张启华

主 编 邵维正

编 委 刘晓宝 李步前 张艳萍

审 订 黄如军 韩洪洪



邵维正

青少年朋友们好！摆在你们面前的这套党史读本，是几位党史研究专家应青岛出版社约请为你们量身定制的，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红色基因就是要传承。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经历了多少坎坷，创造了多少奇迹，要让后代牢记，我们要不忘初心，永远不可迷失了方向和道路。”

我们这套书就是以“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为主题，以党的历史发展进程为主线，以传承红色基因为主旨创作出来的新颖、系统、通俗的党史读本。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至今，已走过百年艰难而又辉煌的历程。中共党史时间跨度大，涉及面广，史料浩如烟海，要构建出一套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党史读本，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具有开创性的事情。

经过反复构思，这套读本另辟蹊径，尝试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党史讲述新方式来构建整体框架，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突出重点、难点、

热点、亮点，梳理归纳了当代青少年最为关注的 60 个问题，按历史阶段分编成 6 卷，依次为《中国有了共产党》《红色星火燎原》《战火中成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春天的故事》《筑梦新时代》。每卷既独立成书，连贯起来又构成一个整体，能够系统地反映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概貌。

这套读本在总体设计上有所侧重，用更多的笔墨来讲述中国人民是怎样“站起来”的。因为只有先“站起来”，才谈得上“富起来”和“强起来”；这样的侧重更能充分展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和优良传统，你们也需要重点学习和了解。

这套读本在叙述方式和语言风格方面，努力贴近青少年的阅读习惯、接受能力，尽量避免空泛说教，力求以生动形象的党史故事作为切入点，从小到大，由浅入深，讲清来龙去脉，剖析前因后果，引发思考共鸣，实现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在版式设计上，注重图文并茂，强化视觉冲击，以增强可读性、趣味性。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青少年时期正是广泛汲取知识的最佳人生阶段，读党史可以帮助你们更好地了解国情、党情和近现代中华民族兴衰成败的曲折历程，深刻领会党的首创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和优良传统，使红色基因浸入心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价值观，进一步增强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认同与热爱，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和信念。

少年强则国强。今天的青少年，既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经历者、见证者，更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生力军，赶上了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的历史机遇。

新时代为青少年朋友们开启了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搭建了人生奋斗的出彩舞台。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你们应自觉激发爱党爱国爱人民的高尚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刻苦学习知识，坚定理想信念，磨炼坚强意志，锻炼强健体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写给青少年的党史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刘晓宝 著

★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

卷首语

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北京30万军民齐聚天安门广场，参加开国大典。典礼开始后，毛泽东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随后，在军乐队奏响的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声中，毛泽东按动电钮，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

广场上，54门礼炮齐鸣28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的28年历程。

由此，中国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对于新中国的美好前景，毛泽东曾经预言：“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前景是美好的，道路是艰辛的。

这正如孩子学步，“站起来”之后，就又面临着“立得住”和“走得远”的新考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所面临的实际情况是：经济上，由于长年战乱，原本就很脆弱的中国经济日益衰退。穷途末路的国民党政府在逃往台湾前，大量发行金圆券，对人民的血汗作最后的疯狂掠夺和榨取，导致通货膨胀愈演愈烈，更使衰败的经济雪上加霜。军事上，人民解放战争还没有结束，国民党还有100多万军队和大批残余势力在负隅顽抗，严重危及社会新秩序的建立和稳定。从国际环境看，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拒不承认新中国，并对新中国实行封锁和威胁。

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与挑战，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并取得历史性巨大进展，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发展富强、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站起来，那么改革开放则标志着中国人民摆脱了“左”的束缚，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是“站起来”。

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同年12月18—22日，我们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

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次大会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又一次伟大觉醒，是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一次伟大创造，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次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

正因如此，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改革开放成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艰辛而辉煌的 70 多年历程，正迈步走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在新时代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伟大奇迹！

写给★
青少年的★
党史

目录



- 一 共产党“经济打零分”吗？ 1
- 二 为什么说抗美援朝的胜利宣告西方列强任意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永远结束了？ 17
- 三 中国是怎样向社会主义过渡的？ 35
- 四 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从何起步？ 51
- 五 科技落后的中国为什么能取得“两弹一星”的重大成就？ 65



- 六** 为什么中国能在 20 世纪 70 年代实现外交新突破? 85
- 七** 为什么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如同遵义会议一样开启了历史性转变? 105
- 八** 为什么说小岗村农民的创举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123
- 九** 为什么说创办经济特区是对外开放的重大突破? 141
- 十** 改革怎样推进到城市经济体制领域? 159

一、共产党“经济打零分”吗？



新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成立的。

当时，中国甚至全世界的人们都在关注一个重要问题：第一次取得全国性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将怎样带领中国人民建设新中国，实现人民富裕、民族复兴？

有的资本家幸灾乐祸地讥笑说：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零分。

西方国家也有人站出来说：共产党解决不了几亿人的吃饭问题，是注定要失败的。

就连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朋友也说：共产党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

可见，当时经济发展严重落后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难题。

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从来不会被困难吓倒，在中国共产党人眼中没有什么困难是不可以克服的。

稳市场

首胜“银圆之战”

1949年2月，北平刚刚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就派人接管国民党的银行和造币厂，开始设计印制人民币。

随后，为了尽快建立新中国的货币体系，解放军解放到哪里，人民币就发行到哪里。

每解放一个城市，军管部门和人民政府就通令该城市以人民币作为唯一合法货币，金条、银圆、外币一律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严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

1949年5月27日，上海迎来了解放。就在当天清晨，几十辆大卡车驶入了上海市区。这些卡车装载着新中国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共4亿元，其中面值最小的为1元，面值最大的为1000元。

在此之前，上海市面上流通的主要是金圆券。

为挽救其财政经济危机，南京国民政府于1948年8月发行了金圆券，并强制人民将黄金、白银和外币兑换为金圆券，疯狂搜刮人民的血汗，使社会陷入混乱、金融面临崩溃。

金圆券流通不到1年，在恶性通货膨胀下已形同废纸。如1949年发行的“陆拾亿（60亿）圆”票面的金圆券，堪称世界上面值最大的纸币之一，但在当时的上海只能买到70余粒大米。

在逃往台湾之前，国民党反动派通过发行金圆券，捞足了真金白银。

为了不让老百姓破产，面对已形同废纸的金圆券，年轻的人民政府采取果断措施，积极建立新的货币体系。

当时的上海军管会规定：人民币1元折金圆券10万元。从5月30日开始，仅用了7天，人们便把手里的金圆券兑换成了人民币。

但是，刚刚进入上海流通市场的人民币立即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一方面，投机商人不顾国家财政困难，拒绝使用唯一的合法货币——人民币，并公然叫嚣：“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

上海。”上海南京路四大私营百货公司依然以银圆为单位给货品标价，其他商店纷纷仿效。

另一方面，金圆券引发恶性通货膨胀的噩梦在普通百姓心中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使他们不敢轻信纸币，觉得金条、银圆才是硬通货。善于买空卖空、操纵物价的不法商人立即发现了投机



1949年5月27日，上海迎了解放。

空间。一时间，上海市中心的主要马路边到处都有“黄牛”。他们手里拿着几块银圆碰撞着，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不时与行人讨价还价，用银圆兑换人民币。

当时，人民银行规定银圆与人民币的比价为1:100，即1块银圆兑换100元人民币。但是，由于投机商掌握了大量银圆，通过“黄牛”操控黑市价格，使得人民币不断贬值。

6月3日，银圆与人民币的比价上升为1:720；4日，银圆与人民币的比价竟狂涨到1:1100。

猖狂的投机活动严重地冲击和动摇了人民币的地位，使物价急剧上涨，人心惶惶不安，直接影响到中国共产党能否控制上海全局，能否保证上海人民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6月5日，上海市委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上海银圆投机严重影响人民币信用的情况，决定采取严厉措施制止这一投机行为。一场短兵相接的金融保卫战——“银圆之战”就此拉开序幕。

5日，上海市财委在一天内向市场投放10万银圆。市场上马上出现挤兑狂潮，这些银圆仿佛石子投入深渊，被一吸而尽，银圆价格却一点儿也没有回落。原来，投机势力的胃口太大，10万银圆根本不够“吃”的。

7日，银圆与人民币比价上升为1:1800，生活必需品价格随之上涨2—3倍。

上海市公安局秘密派出侦察员，查明操控黑市价格导致人民币快速贬值的活动发端于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

这幢大楼每天聚集着大批投机分子。每天上午，他们谋划敲定黄金、银圆、美元3种硬通货的交易比价，然后通过电话通知分散在市区各角落的“黄牛”，按统一比价操控黑市交易。

6月8日晚，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采取政治手段干预市场，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进行查封，并惩办为首的一批违法犯罪分子，坚决打击投机捣乱活动。在向中央汇报后，中共中央华东局的这一决定得到了中央批准。

经过一番周密侦察和部署，10日上午8时，200余名便衣警察分散进入证券交易所大楼，控制了所有通道；10时，华东警卫旅派出1个营的兵力对整座大楼实行军事包围；紧接着，上海12000余名工人、学生在外围封堵交通并向市民作宣传解释。

随着一声令下，散布在大楼中的公安人员同时亮出身份，进行突击搜查。在场的 2000 多名投机分子一下子慌了手脚，他们



上海证券交易所旧址

做梦也没想到共产党会有如此的铁腕钢拳，都被吓破了胆。

这是一场干净利落的歼灭战，公安人员当场扣押为首分子 200 多名、违法情节较轻的 1800 多人（后被陆续释放）；抄没黄金 3642 两、银圆 39747 枚、美元 62767 元、港币 1304 元、人民币 1545 万多元以及投机分子囤积的大量呢绒、布匹、颜料、肥皂等商品。

查封证券交易所大楼后第二天，随着大批投机商落网，银圆与人民币比价猛跌，物价回落，人民币的主导地位很快得到了确立。

之后，以武汉、广州为中心的华中、华南地区也开展了打击金融投机、禁止金银外币流通的大规模行动，有力遏制了全国范围的银圆投机活动。

“银圆之战”最终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平物价

再赢“米棉之战”

“银圆之战”的胜利，打击了金融界的投机势力，但并没有让各类投机商彻底降服。

投机商们认为“银圆之战”是人民政府靠枪杆子取得胜利的，那不算是真本事。他们还要和人民政府进行新的较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上海等大城市普遍物资短缺，加上受通货膨胀影响，人们手里有了钱，就赶紧去购买生活必需品，囤积在家里，这就给投机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

投机商们又把目光瞄准“两白一黑（米、棉、煤）”等商品，大量囤积粮食、棉纱、棉布和煤炭。各地物价再次掀起上涨狂潮。

“米棉之战”由此展开。

从1949年7月到1950年2月，人民政府与投机商展开了3个回合的大较量。

第一回合的较量是在1949年7月，投机商首先哄抬纱价，冲击棉纱市场，接着又将目光转向当时紧缺的粮食和煤炭。

特别是7月11—16日的6天之中，因投机商哄抬米价，米价上涨了96%；16日起，投机商又转而哄抬纱价，冲击棉纱市场。如此循环哄抬物价，造成市场一片混乱。

在6月27日—7月30日的33天中，上海批发物价指数上涨了153%，纱价上涨了1倍，米价上涨了4倍！

国民党特务趁机叫嚣：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就能置上海于死地。

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也是人民政府抑制物价波动、打赢“米棉之战”的重心所在。

以陈云为主任的中央财经委员会沉着应对，精心部署铁路交通部门在全国范围集中调动粮食、棉纱等主要物资。陈云亲自坐镇上海指挥这场战役。

这一次，人民政府主要使用的是经济手段。

通过动员铁路交通部门，人民政府将大批粮食、棉纱、煤炭等物资从全国各地紧急调往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准备用调集大量物资、选择有利时机集中抛售的方法压垮不法投机商。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
和奠基人之一——陈云

7月，国营贸易公司在上海抛售的棉纱、棉布、大米、面粉占到市场成交总量的1/3以上；与此同时，工商部门也加强了市场管理，对囤积物资的不法商贩进行了惩处。

这些举措有力打击了抢购、囤积等投机活动，控制了物价上涨的幅度。

第二回合的较量发生在1949年11月。随着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的胜利推进，大量游资和投机商进入上海，于是上海的主要物资很快掀起了新一轮涨价风潮。上海又一次成为“米棉之战”的主战场。

由于有了上一次较量的斗争经验，党和政府对货币供应和价格

波动之间的规律有了更深的认识。中央财经委员会在具体分析了市场上的商品和流通中的货币的情况后作出果断决策，指示各地国营公司在抛售物资上“大步后退”，保存实力，除必须应付的门市以外，暂时不将主要物资大量抛售。

按照中央的精心部署，各地一方面加强物资调运，另一方面尽量设法紧缩通货。一切准备就绪后，当11月下旬市场物价在投机商的哄抬下达到顶点之时，中央财经委员会连续发出指示，上海、北京、天津、武汉、沈阳、西安等大城市将已调运集中起来的主要物资趁物价高涨时统一向市场大量抛售。

一些仍不死心的投机商认为物价还将上涨，不惜以高息拆借巨款继续吃进这些物资。这时，国营公司凭借雄厚的实力，将大量粮食、棉纱、棉布等紧俏商品在同一时间向市场敞开抛售，并逐步降价。这一招令投机商们措手不及。

10天后，粮、棉等商品价格快速下跌30%—40%。

直到此时，贪婪的投机商们才如梦初醒，发现自己囤积的商品已无利可图，并且越囤越亏损。无奈之下，他们只得急忙抛货还债，结果越抛价格越低，最后不得



米、棉等商品既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又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不赔本卖货还债。

据估计，在这次稳定物价斗争中，棉布行业的投机商亏掉 253 亿元。不少投机商因借了高利贷囤积商品，最终因资金周转不灵而破产。

第三回合的较量发生在 1950 年 2 月。1949 年底，解放军解放全国的步伐由华南、西南、西北方向开始向边疆迈进，军费开支也因此而增加。到 1950 年 1 月，人民政府负担薪酬的公职人员已增至 900 万人，而财政收入一时难以大幅度增加。

针对这种情况，中央财经委员会指出：市场物价要允许其上涨，但应有计划地使之逐步上涨，防止其短期内暴涨。但是，由于 2 月 6 日国民党反动派对上海的发电厂等重要设施进行轰炸，上海 70% 的工厂一度停产，物价随后开始上涨。

这时，投机商们又一次开始高息借款，拼命买进。有的不法商人收粮一直收到农历大年三十的晚上，然后烧香拜神，祈求来年正月初五财神爷上门，能够大发横财。

由于对形势早有估计，早在 1949 年 12 月，中央就从中南、西南、东北等地调运 35 万吨粮食到上海。

2 月 21 日，即大年初五，粮食市场虽“红盘”开出，但出乎投机商意料的是，粮食价格不仅没有上涨，反而连续下跌。

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的部署下，上海广泛开设国营粮店，连续抛售了 10 万多吨大米。投机商们震惊了，他们搞不懂共产党从哪里弄来那么多大米。最后，他们不得不亏本把囤积的大米全部吐出。大

批投机商因此破产，私人银行和钱庄因此倒闭一半。

“米棉之战”，人民政府又一次取得了胜利。

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投机分子终于低下了头，对共产党管理经济的能力不得不叹服。

上海一位很有影响力的民族资本家事后感叹说：6月银圆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物价，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

从此，投机商们再也难以在市场上兴风作浪，持续了十几年的通货膨胀终于被制伏。到1950年，全国物价基本趋于稳定。



在“米棉之战”中，上海的国营粮店为稳定物价作出了重要贡献。图为20世纪80年代上海的一个国营粮店。

固根本

统一财经工作

几次平抑物价的斗争，人民政府都取得了胜利，但这只是暂时性的，因为没有消除物价上涨的根源。

这一根源就是全国财政经济没有统一起来，收支脱节，中央财政缺乏坚实的基础。这一根源不消除，市场随时有可能出问题。

1950年2月，陈云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强调，为了战胜暂时的财

政困难，在落后贫困的基础上前进，必须尽可能地集中财力物力，加以统一使用。

之后，经过3个多月的充分酝酿，1950年3月3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

统一财经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仅1个月，财政状况就开始好转，中央财政收支接近平衡，市场进一步稳定。

毛泽东在1950年4月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第七次会议上对稳定物价、统一财经等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它们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国内外那些对中国共产党能够管好经济持怀疑态度的人，对中央人民政府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使如此剧烈的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大呼意外，不得不表示佩服，称其为“奇迹”。

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是坚强有力的，在管理经济上也是非常有办法的。

名言金句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毛泽东

读党史 长智慧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军即使能够在战场上打败腐朽没落的旧王朝，却往往在夺取政权后不久就遭到失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由此可见，破坏旧世界难，建设新世界更难。

中国共产党从当年确定“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到把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由革命战争转移到生产建设，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转变，这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领导经济建设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直接关系到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能不能在城市站得住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通货膨胀，经济衰败；成立1年后，市场稳定，经济恢复。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方法论的有力武器，不但懂得经济规律，而且善于运用经济规律来解决经济问题。

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结束了自抗战胜利以来人民连续多年深受

其害的恶性通货膨胀，为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创造了条件。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在财经战线上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

青少年朋友，我们每个人在成长道路上也必将面临许多新的问题。面对新环境和新挑战，我们只有敢于打破旧观念，主动学习新知识，积极学习新本领，不断掌握新方法，才能有效应对各种困难与考验，才能闯出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写给★
青少年的★
党史

二、为什么说抗美援朝的胜利宣告西方列强
任意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永远结束了？



1950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庆日。天安门广场上红旗飘飘，人如潮涌。

上午11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走上天安门城楼，向沸腾的人群招手致意。在欢乐的海洋中，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毛泽东的脸上不时闪现着一丝忧虑。这忧虑来自与我们一江之隔的邻邦——朝鲜。

艰难的抉择

1950年6月25日凌晨，朝鲜战争爆发。

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公开宣布美国武装援助南朝鲜，干涉朝鲜内政。同时，他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公然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

2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政府侵略朝鲜、中国台湾及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

但是，美国不顾中国的警告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反对，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组成以美国军队为主，英、法等15国有少量部队参加的“联合国军”，扩大侵朝战争。

战争初期，朝鲜人民军迅速越过三八线，胜利向南推进；8月，朝鲜人民军一度将南朝鲜军队和美军围困在朝鲜半岛最南端的釜山港一带。

9月15日，美军以优势兵力在朝鲜中部的仁川登陆。25日，美

军占领汉城。战场形势出现逆转。

10月1日，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北上。同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朝鲜人民军无条件“放下武器，停止战斗”。

在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下，朝鲜政府和金日成首相在10月1日和3日写信和发电报两次请求中国政府出兵支援。信中说：

“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极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也接到了金日成的求援信，但顾忌苏联出兵会引起苏美冲突，可能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因此建议由中国出兵。

敢不敢迎战当时世界上经济实力最雄厚、军事力量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

这对仅成立1年、百废待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是一个空前严峻的考验。



朝鲜战争中，美国组织成立“联合国军”，悍然发动侵朝战争。“联合国军”气焰嚣张，叫嚣着要速战速决。图为“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

出兵，还是不出兵？

这个重大问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面前。

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会议，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和中国出兵问题。会议气氛严肃而紧张。

毛泽东认为出兵朝鲜已是十万火急。与会多数同志则认为出兵朝鲜应慎重行事。

当时，中美两国的国力相差悬殊：1950年，中国的粗钢产量只有61万吨，工农业总产值仅为100亿美元。然而，美国的钢产量为8700多万吨，是中国钢产量的140多倍；工农业总产值为2800亿美元，是中国工农业总产值的28倍。

此外，美国拥有原子弹和最先进的常规武器装备，具有最强的军工生产能力，而中国当时还没有核武器，常规武器装备也



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拥有原子弹和最先进的常规武器装备。

很落后。

在这样悬殊的敌我力量对比下，如果出兵参战，能不能打赢？如果打不赢，会不会“引火烧身”，严重影响国内经济建设？

会上，有人提出：最好不出兵，如果真要出兵，那也只能是“出而不战”，屯兵于朝鲜北部，视情况而定，“能不打就不打，这是上策”。

周恩来认为：现在已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美国逼着我们非打不可。朝鲜政府又一再请求中国出兵，我们怎能见死不救？

10月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是否出兵朝鲜的问题。

这时，正在大西北商讨研究开发大西北规划的彭德怀也赶来参加了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不赞成出兵的人仍然占据多数，理由是：新中国急切需要的是医治战争留下的创伤，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中国全境还没有完全解放，一些边远地区和岛屿上还残留着人数众多的国民党反动派的部队；我们与美国相比，无论工业力量还是军事装备都相差甚远……

赞成出兵的理由是：一旦“联合国军”打到鸭绿江边，对新中国将形成巨大的威胁；我国台湾已被美国控制，如果整个朝鲜也被美国占领，中国就会处于美国势力南北夹击的态势下，中国的国家安全从根本上就失去了保障……

彭德怀没有发言，但他的心里已经作出决定。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派人把彭德怀接到自己的办公室，专门征

求他的意见。彭德怀毫不犹豫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立即出兵。当毛泽东提出把挂帅出征的重任交给他时，他坚定地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毛泽东略带感慨地说：“这我就放心了。”

在下午的会议上，彭德怀发言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果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

经过反复权衡利弊，会议最后作出决定，由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作战。

对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彭德怀曾作过这样的评价：“这个决心不容易定下，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

巨大压力下毅然出兵

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抗美援朝决定的当天，苏共中央政治局也召开会议，再次讨论出兵朝鲜问题。苏共中央最终取得一致意见：避免苏联直接与美国发生冲突，即使是因此而放弃北朝鲜。

10月8日，周恩来飞抵莫斯科，告诉斯大林中国出兵的决定，并与他商谈苏联军事援助和出动空军配合作战的问题。

同日，毛泽东下令东北边防军改称“中国人民志愿军”，“迅速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这时，远在莫斯科的周恩来与斯大林的会谈还没有任何结果。

出兵朝鲜，再次面临严峻考验！

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毅然决然地作出决定：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我们也要出兵援朝。

19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

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

.....

当代青少年不少人曾听过这首脍炙人口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或许很多人以为志愿军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昂首挺胸进入朝鲜的。

事实上，为了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志愿军是趁着夜色隐蔽渡江的。雄赳赳、气昂昂体现的是志愿军藐视敌人、敢打必胜的英雄气概！

1950年10月25日是中国和朝鲜人民永世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拂晓时分，南朝鲜第1

云山之战
旗开得胜

师先头部队沿云山至温井公路继续向北进犯，做梦也没想到已经钻入了东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0军的埋伏圈。

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打的第一仗。

志愿军从公路两边向敌人发起突袭，以拦头、截尾、斩腰等战术将其全歼。同时，南朝鲜第6师也遭到了迎头痛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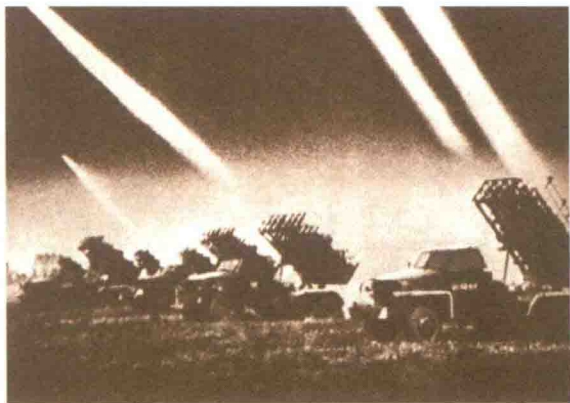
正是从这一天开始，长达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拉开了序幕。这一天后来被确定为抗美援朝纪念日。

正在平壤举行阅兵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接到从前线传来的“遭遇强大抵抗，南朝鲜军队伤亡惨重”的报告。直到天黑，麦克阿瑟还在想：是不是中国军队参战了？

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马歇尔事后沉重地说：“我们认为什么都知道，而实际上什么也不知道。然而，对方却一切都知道。于是，战争开始了。”

11月1日傍晚，
不可一世的美军王牌
骑兵第1师向朝中边
境推进。中美两国军
队现代史上的第一次
交锋在云山开始了。

西线志愿军第39
军以8个步兵团的兵
力向云山之敌发起围



“喀秋莎火箭炮”是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击敌人的利器。

歼战。据美军战史记载，中国军队的炮火十分猛烈，一检查弹道，发现中国军队使用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在斯大林格勒让德军胆战心惊的82毫米“喀秋莎火箭炮”。

直到这时，美军才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中国军队已经站在了他们的面前。

云山之战中，志愿军集中优势兵力，白天隐蔽，夜晚攻击，使美军的优势火力无法充分发挥作用。美军被迫在坦克掩护下开始突围。突围路上，美军又遭遇志愿军截击，坦克大多被炸毁。经过两个夜晚的激战，美军除个别突围外，全部投降。前来增援的美军也被击退。

11月5日，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结束。

这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歼敌1.5万余人，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到清川江以南，从而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使志愿军在朝鲜站住脚跟，为尔后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云山之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次以劣势装备沉重打击美军的成功战例，粉碎了敌人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为朝鲜人民军赢得了休整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志愿军取得了同拥有现代化装备的敌军作战的经验，为以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云山之战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作为典范战例，被日本陆军自卫队干部学校收入《作战理论入门》一书。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顽强，沉重打击了敌人。图为油画《出击之前》（何孔德 画）。

最可爱的人

在路河冰冻、衣被单薄、粮弹缺乏、
吃一把炒面就一把雪的极其艰难困苦
条件下，志愿军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同

拥有高度现代化装备的美军英勇作战，又进行了4次互有攻守进退的大的战役。到1951年6月，志愿军通过5次战役共歼敌23万余人，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

美国不甘心这5次战役的失败，动员了它1/3的陆军、1/5的空军和近半数的海军投入朝鲜战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构筑坑道、利用地形，以阵地防御战和运动反击战相结合的作战方法，大量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在这段时间里，志愿军进行了数以万计艰苦卓绝的战役战斗，其中以上甘岭战役尤为悲壮激烈。

1952年10月14日，美军向朝鲜金化北边的上甘岭地区发动了空前猛烈的所谓“金化攻势”。

为了夺取志愿军两个加强连防守的597.9高地和537.7高地，美军先后调动3个师6万人的兵力，集中了300余门大炮，出动了170余辆坦克和3000架次飞机，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攻击，平均每天向方圆不足4平方公里的志愿军阵地发射炮弹数万发，最多时一昼夜达30万发，致使山头的高度几乎被削低2米，山上寸草不留，石头被炸得粉碎。

志愿军为了抗击敌人，先后投入了4万多兵力，平均每天打退敌人三四十次进攻。战士们在光秃秃的山头上，依托坚固的坑道工

事顽强机智地同敌人作战。

10月17日，营部通讯员、代理班长黄继光所在的部队在冲锋途中被敌人的一个火力点封锁住了前进的道路，前去爆破的几名战士先后牺牲了。

危急关头，黄继光高喊“让祖国人民听我胜利的消息吧”，猛扑到敌人火力点前，用身体挡住了敌人的枪眼。随后，战友们冲上来消灭了敌人。

11月2日，守备597.9高地的八连在接连几天的阻击战中伤亡很大。有一次，两个连的美国兵冲上了山头，并插上了信号旗。战士王万成看见后怒火中烧，抱着两个爆破筒冲了过去，在敌人中间拉响了爆破筒。敌人血肉横飞，纷纷倒地，余下的敌人也抱着头滚下了山。电影《英雄儿女》中的英雄王成就是以他为原型。

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中涌现出30多万名英雄功臣和近6000个功臣集体。他们当中，有率领全排打退敌人9次进攻、最后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的杨根思，有为了整体利益、在潜伏中任凭烈火烧身



邱少云烈士纪念碑

而壮烈牺牲的邱少云，还有在冰水中为营救朝鲜少年而献出宝贵生命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

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是第一批入朝参战的人员，英勇牺牲在朝鲜战场。

军旅作家魏巍在那篇著名的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中曾动情地写道：

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坐到办公桌前开始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一起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说：“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地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朋友！你是这么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你一定会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尴尬的美军司令官

战场上的失败，迫使美国不得不回到谈判桌前。

经过反复较量，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双方谈判代表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

随后，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分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停战协定于朝鲜时间27日晚10时生效。

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与世界头号强国之间的一场国力悬殊的较量。它的胜利，对朝鲜、对中国、对东方乃至对全世界都有着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这场战争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保卫了朝鲜的独立和我国的安全，维护了远东和世界的和平。

这场战争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没有取得胜利的战争。

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克拉克上将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



“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

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

这场战争的胜利，使中国人民空前地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使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统一和社会稳定，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赢得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

更为重要的是，这场战争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软弱可欺的形象，使包括美、苏在内的世界各国都认识到必须重新估计中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分量，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空前提高。

从此，帝国主义再也不敢轻易地欺侮和侵犯中国了。

名言金句

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彭德怀

读党史 长智慧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中华儿女历来有血性、有担当，在民族陷入危机时，在面对霸权欺凌时，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政权刚刚建立、尚未巩固的情况下，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顾国际舆论大兵压境的严峻挑战，审时度势，敢于亮剑，以非凡的胆略毅然出兵朝鲜，与朝鲜军民一道抗击美国侵略者，将美国侵略者从鸭绿江边赶回三八线，实现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目标，维护了国家安全与世界和平。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人民军队的军威，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光辉典范。抗美援朝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第一场大规模的国际性局部战争，双方投入战场的兵力最高达300多万。交战双方武器装备水平相差悬殊。使用先进武器的美国军队掌握着战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其地面部队全部机械化；中国人民志愿军基本上是靠步兵和少量炮兵作战，武器装备

相当落后。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取得了辉煌胜利。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不仅使新生的人民政权日益巩固，为恢复国民经济创造了良好的内外环境，而且推动人民军队建设向现代化迈出了一大步。由此，新中国迎来了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崇高风范的生动写照，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生长在和平年代的今天的青少年可能无法体会那场战争的艰苦与残酷，但应该懂得抗美援朝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靠的是革命正气、战斗勇气。毛泽东对这场战争作出了生动的总结：“美军钢多气少，志愿军钢少气多。”

事实证明：觉醒了的、敢于为祖国的独立和安全而奋起战斗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三、中国是怎样向社会主义过渡的？



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时就确立的奋斗目标。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要走向富强，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党经过探索后指出，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实现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然后第二步才能转入社会主义。这是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怎样才能向社会主义过渡呢？

毛泽东支持土地改革

“耕者有其田”是几千年来无数中国百姓的梦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仍维持封建土地制度，占农村人口不到 10% 的地主、富农占有 70%~80% 的土地，凭借占有的土地残酷剥削和压迫农民；占农村人口 90% 多的贫农、雇农和中农却只占有 20%~30% 的土地，终年辛勤劳动，却受尽剥削，生活不得温饱。

这种封建土地制度严重阻碍着农村经济和中国社会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 1950 年 6 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关于农村阶级成分的划分，具体规定了以经济地位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等成分的标准。

于是，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从 1950 年冬到 1952 年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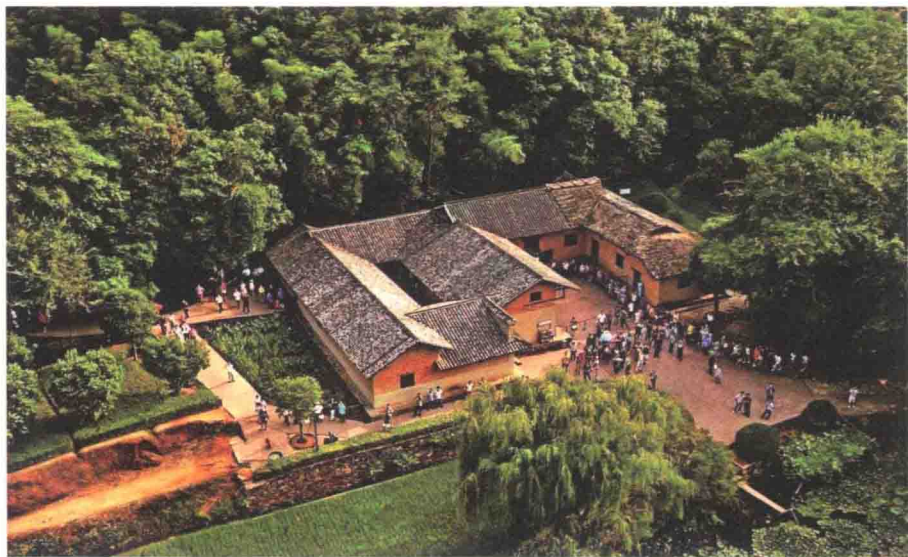
党领导占全国人口一多半的解放区进行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

在土地改革的过程中，曾发生了一件毛泽东为自己家划成分的事。

1950年深冬，湖南韶山乡的土地改革运动已进入划分成分的阶段，应该给毛泽东家划什么成分呢？当时负责土地改革的农会主席兼乡长毛寅秋的心里非常矛盾。

按照土改政策和毛泽东的家境，应将毛泽东家划分为富农。韶山冲有600多户人家。毛泽东的祖父毛思普是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曾因为家境衰落，不得不忍痛把祖传的部分田产典当给别人。

到了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时，家境逐步好转起来。毛贻昌17岁当家理事，由于负债被迫在湘军里当了几年兵，积攒了一些钱。回



湖南韶山毛泽东故居

家后不久，他不仅赎回了被典当出去的土地，还新买了一些土地，让自己家的土地增加到20多亩，每年可收获大约4吨稻谷。

湘潭有着远近有名的米市。毛贻昌喜交游、善经营、精通为商之道，资本逐渐积攒到两三千元，并自制了“毛义顺堂”的流通纸票，成了韶山冲很有名气的富人。

但是，要把人民领袖毛泽东的家庭成分划为富农，毛寅秋心里既不安又不忍。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

家乡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您的亲切关怀下，土改已进入划分成分、分田的阶段了。您老是知道的，韶山是山多地少，初步推算，人均九分三左右，不知您老一家有几口人分田，特向您汇报，请指示。

毛泽东收到信后，立即明白了毛寅秋的言外之意。他望着信沉思良久。他想的不仅仅是自家的成分，而是党的土改政策。

经过慎重思考，毛泽东把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俩叫到身边，给他们看了信后说，咱们家应定为富农，这是毫无争议的事。你们俩回韶山去一趟，把我的意见告诉他们：第一，划分为富农；第二，所有财产分给农民，带去300元钱，作为退押金；第三，人民的政府执法不徇情，照政策办事，人民会相信政府。

不久，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俩回到韶山，按父亲的要求妥善地处理了这件事。

由此可见，毛泽东处处想的是国家这个大家，对自己的小家从来都是严格要求的。

到1952年底，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和港澳台外，土地改革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基本完成，全国有约3亿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还分得了大量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从根本上铲除了中国封建制度的根基。

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封建斗争取得的一个历史性胜利。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 提出

1953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二，噼里啪啦的爆竹声不时响起。人们走亲访友，串门拜年，沉浸在欢庆新年的喜悦中。

这一天，毛泽东离开北京。他所乘坐的专列一路南下，顶着凛冽的寒风奔驰在京汉线上。

这是毛泽东进北京城后第二次外出视察工作。

这一天上午，专列路过河北。毛泽东想找一位县委书记了解当地农村互助合作发展的情况。于是，邢台县委第二书记、县长张玉美被请上了专列。

北方的2月，车外寒风呼啸，车内会议室里却暖意融融。毛泽东向张玉美详细询问邢台县的农业互助合作发展情况。当听到全

县入社入组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87%时，毛泽东又高兴又惊讶，问原因是什么。

张玉美回答：

第一，邢台是老解放区，互助合作已有10多年的历史；

第二，党中央关于互助合作的方针、原则和办法符合民意，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比如，一个叫东川口的村，有70户农民，1个多月的时间全村就实现了合作化，1952年建社的当年粮食就增产了12%。

毛泽东听了十分兴奋，说：“是啊，多数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这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关键是我们领导采取什么态度。”

随后，他又问办社过程中有哪些困难和问题，张玉美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听得十分专注，表情时而凝重，时而轻松，频频点头。

不知不觉，专列已经驶入郑州火车站。毛泽东从椅子上站起来，在车厢里来回踱步，最后说：“看来，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做法。”

2月16日深夜，专列抵达武汉。第二天晚上，毛泽东与中共中



毛泽东在列车上仍专心工作，批阅文件。

央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汉市委的几个领导人吃饭。饭间和饭后，毛泽东询问最多的是武汉市的工业、手工业和公私合营的相关情况，谈得最多的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

2月19日中午，毛泽东离开武汉，乘“长江号”军舰顺流而下，

在九江换乘“洛阳号”军舰，20日到达安庆。第二天上午，毛泽东走上江岸，走进群众的菜地，一边指点着说出蔬菜名称，一边询问大家的生产、生活情况……



毛泽东非常关心农村的发展，曾多次深入田间地头，了解当地农业的发展情况。

毛泽东随后乘军舰来到南京，继而北上，经徐州、天津，于26日回到北京。一路上，他向江苏省、天津市以及其他一些省市的负责人着重了解当地经济的发展情况。

这次南下视察，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问，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对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进行调研。

通过这次较大范围的调研，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想已经基本成熟。

回到北京后的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就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了中

央政治局会议。

虽然是刚刚视察回来，但毛泽东的脸上并没有丝毫的疲惫。他向与会者讲述了自己一路上的见闻和感受。

谈到在湖北视察时和孝感地委负责人的谈话时，毛泽东说：什么是过渡时期？过渡时期是走向社会主义。我给他们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了1年，两步两年，3步3年，4步4年，5步5年，6步6年……10到15年走完了。我让他们把这话传达到县委书记、县长。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还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防止急躁情绪。

会议一直开到次日凌晨。

6月13日，全国财经会议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举行。

6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作了系统阐述：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同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把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是党在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问题认识上的一个重要改变，是符合新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和规律的。

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土地改革胜利完成以后，我国农村的生产力从封建剥削制度下获得了解放。但是，在我国农业中占绝对优势的仍然是小农经济，而工业化不能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因此，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位列三大改造之首。

怎样改造呢？

提倡个体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党的一贯主张。

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土地改革已经完成的农村，为解决农业生产中单一农户劳动力、畜力、农具不足的困难，在自愿互利基础上普遍发展了劳动互助组织，主要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是临时互助组。一般由几户农民在农忙季节临时组织起来，进行换工互助，农忙过后即解散。这是互助组的初级形式。

第二种是常年互助组。在规模上，常年互助组一般比临时互助

组大，组员也比较稳定；在互助事项上，常年互助组除全年在主要农业生产活动中开展劳动互助外，还进行其他农副业的互助结合；常年互助组的



劳动互助组织的成立，解决了单一农户劳动力、畜力、农具不足的问题，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组员之间有初步的劳动分工，有的常年互助组还积累了少量的公共财产。这是互助组的高级形式。

随着土地改革后多数农民经济地位的上升，农村中开始出现农民中农化的趋势。中农既是小生产者，又是小私有者。其中，还有少数富裕中农上升为新富农。

如何看待农村中出现的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现阶段要不要削弱以及动摇农民小私有基础？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促使党内在引导农业互助组织走向较高级形式的问题上统一了认识。

我们党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

1953年12月，党中央通过《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认为以土地入股为特征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显示出优越性，

可以成为引导农民过渡到土地公有的完全社会主义的高级社的适当形式。

贯彻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全国农村很快掀起了大办合作社的热潮。当时的许多统计材料显示，合作社80%以上都增产增收，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

手工业所提供的产品几乎涉及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手工业历来在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初期，由于我国当时的工业基础薄弱，发展手工业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当时我国的手工业是分散的个体手工业，生产条件落后，抵御风险的能力很弱。

因此，党确定改造个体手工业的任务就是逐步引导手工业劳动者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先从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开始，到组织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逐步过渡到高级形式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到1954年底，全国手工业合作组织达到4.17万个、社（组）员121.35万人；手工业当年产值达到11.7亿元，是1953年产值的1.2倍。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

1950年春末夏初，中南海碧水盈盈，颐年堂喜气洋洋。荣毅仁被通知出席毛泽东招待部分党外人士的宴会。

这是荣毅仁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当荣毅仁等人来到时，毛泽东在门前热情地迎接他们。当介绍到荣毅仁时，毛泽东握住他的手亲切地说：“荣先生，你是大资本家呀！”

周恩来在一旁打趣地说：“他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少壮派’。”

时年 34 岁的荣毅仁连忙说：“哪里……哪里……”

毛泽东看到荣毅仁毕恭毕敬的样子，微笑着又补充了一句：“你来了，很好。”

宴会就像家人团聚，气氛轻松欢快。席间，毛泽东鼓励大家要为人民做好事，要一贯地做下去，好事做得越多越有名誉，人民的奖励也越多，人民是不会忘记



荣毅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振兴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红色资本家”。

的。毛泽东的话，语重心长，感人肺腑，既是谆谆的嘱咐，又是殷切的期望，使荣毅仁感到无比温暖。

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中，荣毅仁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为民情怀和优良作风。他坚定地表示：“我是一个资本家，但是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谁都认识到只有实行社会主义，走人人富裕的道路，中国才能够强盛繁荣。”

1954年5月，荣毅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提出对申新纺织公司等荣氏企业实行公私合营。他的这一做法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起了带头作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振兴作出了重要贡献。荣毅仁因此赢得了普遍尊重，被誉为“红色资本家”。

到1956年初，从首都北京开始，全国范围内出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在1个月内，全国有118个大中城市和193个县的私营工商业户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新中国成立7年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确立。

名言金句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读党史 长智慧

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不同形式,按照一定步骤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既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又保证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三大改造的完成,使农业、手工业个体所有制基本上转变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公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基本上转变为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公有制。这两种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主体地位。

经过7年努力,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立起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符合中国国情,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集中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共和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当然，必须承认的是：后期的改造工作由于过于急促和粗糙，遗留了一些问题，说明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党和人民需要长期努力的历史过程。

今天的青少年，可能对“阶级成分”“过渡时期”“生产合作社”“公私合营”等词语和概念感到陌生，但必须记住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从何起步？



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这是毛泽东在 1954 年 6 月对当时中国工业水平的形象描述。

这段话及其所反映的现实令几代中国人刻骨铭心，更激发起他们奋发图强、奋起直追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实现国家工业化，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独立和富强，使中国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由之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绝对优势；工业基础薄弱，工业技术水平低下，技术落后，设备陈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实现工业化，应当采取怎样的方针，通过怎样的途径，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首要问题。

轻工业与重工业

世界各国如何实现工业化？

一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路，它们从发展轻工业开始，一般用 50—100 年的时间才实现了工业化。

一种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走过的路，它从重工业建设开始，只

用10多年时间就实现了工业化。

1953年初，一场有关中国工业从何起步的激烈争论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和不安。他非常清楚，这场争论是由他在去年6月全国财经会议上发表的讲话引发的。

在那次会议上，当听取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情况的汇报时，他说：为了保证国家的独立和安全，我们在编制五年计划时要把建设重点放在重工业上，以增强国防力量，向社会主义前进。

会议结束后，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被提了出来。

一种意见认为：发展轻工业，投资少，见效快，短期内能迅速改善人民生活。中国经历了长年的战争，经济亟待恢复，人民生活亟待改善，应该多搞些轻工业。有人甚至提出，工商业者专搞轻工业，国家专搞重工业，这样分工合作，利国利民。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如果没有机器制造业，发展轻工业的装备



实现国家工业化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理想。

从哪里来？没有钢铁等基础工业，机械制造的原材料从哪里来？没有能源和交通运输，整个经济又怎能正常运转？如果机器依赖进口，会带来很多问题，其一我们缺乏资金，其二帝国主义实行封锁，其三全部依靠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非长久之计。

争论越来越激烈。毛泽东深感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不迅速加以解决，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就无法展开。

于是，在1953年9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毛泽东就选择怎样的工业化发展道路问题有针对性地讲了一段话。他说：

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

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

毛泽东关于“施仁政”的一番讲话说服了与会的所有人。大家无不点头称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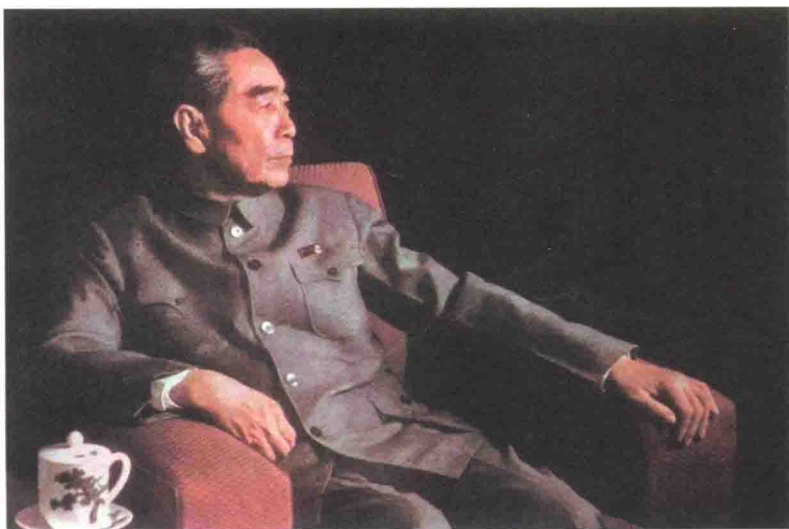
同时，毛泽东的讲话也消除了人们的思想疑虑，坚定了人们对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国家工业化这一方针的信心。

小数字与大计划

为准备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早在1951年初，毛泽东就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经济建设”的重大决策，决定自1953年起，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要求立即着手进行编制五年计划的各项准备工作。

随后，由周恩来总理牵头成立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

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向实现工业化的梦想迈出了第一步。



周恩来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始终虚怀若谷、谦虚谨慎。

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子子孙孙的长远幸福，周恩来在领导和参与“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时，废寝忘食，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

周恩来工作非常细致，非常注意数字的根据和来源，几乎每一个数字都要过问，每一个百分比都要亲自计算。正是在他这样细致的要求下，一些数字差错被发现并得到纠正。

当发现数字有出入时，他就严肃而又耐心地给工作人员指出来。指出后，他又怕他们有思想负担，就说：全国那么大，数字不容易搞对，每个数字搞准也不大容易，你们可以回去再好好算算。

由于当时我国对编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没有实践经验，技术装备落后，缺少资金，缺少人才，再加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并实行全面封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对草案进行多次讨论后作出决定，向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请求援助。

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带着试编出来的“一五”计划轮廓草案，乘3架中苏航空公司的飞机，怀揣中国人民的百年梦想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重托飞往苏联。

经过3天的飞行后，周恩来一行终于抵达莫斯科。几天后，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设晚宴热情招待了中国代表团。

斯大林对中国代表团的来访非常重视，在半个多月时间里两次与周恩来、陈云会谈。

9月3日，周恩来与斯大林进行了第二次会谈，详细介绍了中国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设想。

斯大林听得非常专注。周恩来介绍完后，斯大林面带微笑地说：中国三年恢复时期的工作“给我们这里印象很好”。

接着，斯大林对中国“一五”时期的经济发展速度提出了中肯而宝贵的意见。他认为，“一五”计划轮廓草案里提出中国5年工业年平均增长20%，这个速度是勉强的，建议降到15%或14%。他强调：计划不能作得太满，必须留有后备力量，以应付意外的困难。他同意帮助中国设计建设一批企业，并提供设备。

对于周恩来提出的苏联援助事项，斯大林明确表示：苏联政府愿意帮助中国制定“一五”计划，愿意为中国提供实现五年计划所需要的技术、设备、贷款等援助，并派专家到中国帮助建设。

“一五”计划从1951年着手编制，到1955年提交全国人大会议审议通过，前后用了4年多时间，五易其稿。

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经过审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

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国情出发，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精心设计、反复论证后取得的科学成果。

“一五”计划的实施，揭开了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篇章。

工业化的“四大件”

五十岁的老司机我笑脸扬啊
拉起那手风琴咱们唠唠家常

想当年我十八就学会了开汽车啊

摆弄那个外国车呀

我是个老内行啊

可就是啊没见过

中国车呀啥模样啊

盼星星盼月亮啊

盼的那个国产汽车真就出了厂

.....

1956年7月14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召开祝捷庆功大会，12辆崭新的草绿色汽车戴着大红花，打扮得像新娘子一样，在万众瞩目中鸣着喇叭，缓缓行驶在中央大道上。

开第一辆车的马国光是个老司机。他过去开的都是外国车。第一次踩下国产车油门时，他万分激动，无比自豪。上面这首名为《老司机》的歌曲，就是根据他当时的心情创作出来的，曾经风靡一时。

第一辆国产汽车还没出世时，毛泽东就给它起好了名字，叫“解放”。

从此以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处可见奔驰而过的“解放”牌汽车。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汽车工业。

5天后的7月19日，我国生产的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进行了首飞，试飞员由曾在朝鲜战场上击落过两架美军飞机的优秀飞行员吴克明担任。



“一五”计划的实施揭开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篇章。图为油画《船厂》（颜文樑 画）。



“这才是我们的飞机！”一进飞机座舱，吴克明就倍感亲切，因为座舱里所有的标识用的都是中文，而不再是俄文了。

点火、加油、离地，吴克明驾驶着中国第一架国产战斗机腾空而起，翱翔蓝天。试飞证明，飞机的各项技术性能全部合格。

当年国庆节，新中国制造的首批喷气式战斗机以雄壮的阵容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中国人不能制造飞机的时代宣告结束了！祖国大地上一片欢腾！

1958年7月20日，新中国第一辆国产拖拉机在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诞生。它有个响亮的名字，叫“东方红”。

1958年12月，新中国第一辆国产坦克在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厂试制成功。1959年10月1日，在国庆10周年大阅兵中，32辆崭新的中国59式坦克首次亮相。它们隆隆驶过天安门广场，宣告中国不能生产坦克的历史结束了。

飞机、坦克、汽车、拖拉机在当时被

人们称为工业化“四大件”。它们的国产化，标志着中国工业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

制造“四大件”的基本前提条件是要有充足的钢铁原料和现代的工业体系。

为了加快中国工业化建设的进程，1953年5月，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协定，约定苏联在钢铁冶炼、有色冶金、煤矿开采、石油炼油、重型机器制造、化工、火力发电等方面援助中国新建和改建工业项目。后经多次调整，“一五”时期苏联援助我国建设重点工程共有156项。

三门峡水利枢纽、鞍山钢铁公司、武汉钢铁公司、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沈阳机床厂、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兰州炼油厂、沈阳飞机工业制造公司等重点工程的建成，初步改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工业落后、工业布局极不合理的状况，有的工程至今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的各项指标大多超额完成，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

1957年，我国钢产量达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296%，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最高年产量的5.8倍；原煤产量达1.31亿吨，比1952年增长96%，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最高年产量的2.1倍；发电量达193.4亿千瓦每小时，比1952年增长166%，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最高年发电量的3.2倍。

当由毛泽东亲自命名的新中国第一辆汽车——“解放”牌汽车试车成功，当新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当新中国第一辆拖拉机缓缓开出厂房，当新中国第一家电子管厂试制成功了10多种电子管，当“一桥飞架南北”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当新中国工业无数个“第一”层出不穷的时候，中国人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名言金句

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毛泽东

读党史 长智慧

新中国的工业化，原有的基础非常薄弱，更受到资金短缺、物资匮乏、技术落后、人才不足等因素的制约，面临的困难很多，任务十分艰巨，但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万众一心、艰苦奋斗，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进程中取得了扎扎实实的成效。

在积极利用外援的同时，党和政府始终坚持不依赖外援的原则，对来自苏联的贷款，从1955年就开始通过出口矿产品和农产品逐步进行偿还；在建设各个重点项目时，十分重视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学习、消化和吸收。

正因如此，当后来中苏关系发生剧烈变化时，我国能够一以贯之地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事实证明：落后者向先进者学习，要坚持开放的态度，更要坚持独立自主，千万不可依赖他人，迷失自我。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在学习中进步，在创新中超越。

五、科技落后的中国为什么能取得
“两弹一星”的重大成就？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在新疆罗布泊的戈壁荒漠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

消息传到北京时，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正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的3000多名演职人员。

周恩来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走到话筒前。他先用双手示意大家停止鼓掌，然后开口说道：今天正式开会前，主席让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但是我要提3个要求：第一，大家不要跳，大会堂的楼板会承受不住的；第二，大家不要高呼口号，我的耳朵会受不了的；第三，注意维护会场秩序。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法国、英国之后第五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这一突破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大家全都屏住呼吸，竖起了耳朵。

“今天，我国在西部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周恩来话音刚落，全场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有人兴奋得蹦起来，接着更多的人跳了起来，后来所有的人像起伏的浪头般不断地跳起落下。

在场的所有人只有一个感觉：作为中国人，此刻是多么自豪和骄傲！

夜晚，北京长安街上人头攒动。人们奔走相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巨龙腾飞，扬眉吐气！

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这一突破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美国合众国际社报道：

中国神话说，喷火的龙是全能的猛兽，它会带来好运气。它始终追逐着一颗火珠子，这象征着中国永远追求着知识。

今年是中国的龙年，龙给中国带来了好运气。神话就说，它会带来好运气。对他们来说，龙已经逮住了火珠子。

科技十分落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什么能够在成立十几年后取得“两弹一星”的重大成就？

**要受人家欺负，就
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
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
并不可怕。

这句流传于世的著名论断，是毛泽东 1946 年 8 月 6 日在延安枣园接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说的。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英勇奋战，取得了节节胜利。美国总统杜鲁门为挽回败局，通过媒体多次叫嚣要使用原子弹。

面对美国的核讹诈，毛泽东表现出大战略家的从容：不要说苏联已经掌握了核武器，杜鲁门不敢冒险打一场原子战争，就是真想在朝鲜投原子弹，也没有义务通知对方。



毛泽东提出了“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1953年初，
美国总统艾森豪
威尔下令将携带

着核弹头的导弹秘密运到日本的冲绳岛，为向中国发射核导弹做准备。1955年，我军解放一江山岛和大陈岛时，美国国会正式通过授权：总统可以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根据这一授权，美国军方研究制订了用原子弹攻击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多种方案。

面对国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在战略上蔑视原子弹的同时，在战术上更加重视原子弹的研制了。

1955年1月15日，一次绝密会议在中南海的一间会议室里召开。毛泽东亲自主持了这次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

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等在京的中央领导人都参加了会议，专门听取了地质学家李四光、物理学家钱三强、地质部副部长刘杰关于原子能等问题的汇报。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开宗明义地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

李四光介绍了铀矿资源和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密切关系，并分析了我国铀矿资源的分布情况。钱三强介绍了原子科学发展简史和美、苏、英、法等国发展原子能的概况，着重介绍了我国近几年所做的有关工作。接着，刘杰作了补充，讲述了1954年下半年我国第一次在广西发现铀矿的经过，并用铀矿石标本和探测仪器现场演示给大家看。

当铀矿石被放在测试放射性的仪器前时，测试仪发出了“嘎嘎”的响声，参会的领导人听了十分兴奋。大家对这小小的矿石竟蕴藏着神话般的巨大能量感到新奇。

与会的领导人一致赞同发展我国的原子能事业。中国制造原子弹这件事就在这次会议上拍了板。

会后，中央领导和科学家们一起吃饭。平时极少沾酒的毛泽东端起了一杯葡萄酒说：“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大家共同干杯！”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

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全世界都有震感

苏联在1949年8月就完成了原子弹的研制和试验。赫鲁晓夫自1953年上台后，一直不同意中国搞原子弹，借口是搞原子弹要花费很多钱，中国有苏联的核保护就行了。

1956年，国际形势急剧变化，赫鲁晓夫迫切需要中国的支持，因此在向中国援助尖端技术这一点上态度有了改变。

经过多次谈判，中苏两国于1957年10月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具体内容包括：苏联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等技术资料，提供包括原子弹、导弹在内的部分尖端武器的制造技术，派有关专家来华帮助开展研制工作。

但是，这项协定只执行了1年多的时间，就因为中苏两党出现政治分歧、两国关系恶化而突然中断。

1959年6月，赫鲁晓夫在访美前夕致信中共中央，说苏联正与美国、英国进行禁止核试验的谈判，为避免谈判受到影响，苏联政府决定两年内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等技术资料。

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心情沉重，但仍以铿锵有力的声音对在场的人员说：“不要怕，没什么了不起！我们还是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很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算的。”

苏联背信弃义的行为让中国人民憋足了一口气，立志一定要研制出自己的原子弹。

1960年8月，200多名苏联专家全部撤回苏联，并把重要的技术资料全部带走。他们还讥讽地说：“离开外界的帮助，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就守着这堆废铜烂铁吧！”

面对困难，毛泽东再次发出号召：自己动手，从头做起来，准备用8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

随即，大江南北的各路人才纷纷向罗布泊试验基地聚集。有一对夫妻各自接到命令后，因保密原因互相隐瞒、分别出发。一天清晨，当妻子在一棵老榆树下等待开往场区的汽车时，突然看到一名男军人朝这边走了过来。等男军人走到跟前，四目相对，两人心里都是一惊，但他们很快平静了下来，心照不宣地相视一笑。直到这时，他们才发现两人都是到罗布泊执行核试验任务的。

指挥我国首次核试验的张爱萍将军听到这个故事后，称赞他们是祖国的好儿女，并给这棵见证了忠诚与爱情的老榆树起了个美丽的名字，叫作“夫妻树”。

从北京的实验室到大西北的建设工地，科技人员、工人、解放军官兵咬紧牙关苦干、实干。虽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许多人因为营养不良得了夜盲症、浮肿病，在沙海中每移动一步、在发射架上每攀登一次，都十分困难，但实验室里的灯光总是彻夜通明，建设工地上的歌声总是高亢嘹亮。

经过两年多的艰辛努力，我国核工业建设取得很大进展。

1963年3月，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完成；11月29日，铀工厂生产出第一批合格产品；12月24日，同步聚焦爆轰产生中子试验成功。

人们看到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的希望。

1964年10月14日，我国首次核试验总指挥张爱萍在新疆核试验基地宣布中央命令：原子弹试验的零点时间定为北京时间1964年10月16日15时。

零点时间即核爆炸时间。

第一颗原子弹采用铁塔上爆炸的方式，就是先把原子弹在地面组装好，再吊升到塔顶进行固定、检查、测试，最后插雷管引爆原子弹。

这座耸立在戈壁滩上的铁塔高102米。站在铁塔上，极目远眺，可以看见周围分布着用于核爆效应试验的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建筑群等，宛如大战前的战场。

当主控制站的技术人员按下电钮后，只见强光闪亮，巨大的蘑菇云翻滚而起，直上云霄。

张爱萍拿起直通北京中南海西花厅的专线电话，兴奋地向周恩来报告：核爆炸成功了。

周恩来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你们能不能肯定这是核爆炸？

张爱萍继续报告说，我们已看到火球，蘑菇云正在上升，铁塔已经消失……

周恩来当即代表党中央向原子弹研制人员和其他参加试验的人

员表示热烈的祝贺。随后，他将这一消息报告毛泽东。毛泽东也严谨地提出：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查清楚再发表。

核爆炸产生的地震波非同小可，以至于远在万里之外的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观测台也测到了这次核爆炸所产生的震波能量。美联社和路透社相继对中国原子弹试爆成功的消息进行了报道，全世界都有了强烈的“震感”。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放《新闻公报》，《人民日报》印发了号外。中国政府在《新闻公报》中明确表示：中国进行必要而有限制的核试验，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消灭核武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给核弹头插上翅膀

有了威力大的原子弹，还得有飞得远的运载工具，才能形成战略威慑。因此，核弹头与导弹的结合试验就被提上了日程。

1965年2月，空军首长亲自确定机组人员，进行投弹前的飞行轰炸训练。从万米高空看去，直径200米的靶标只有5分硬币大小。投普通的航空炸弹，投在靶心周围200米范围以内就算优秀，可是投原子弹的要求要比这个高得多。

在原子弹靶标周围，每隔一定距离都修建了房屋、铁路、桥梁、

地下工事等设施，放置了车辆、舰艇、飞机、坦克、大炮等各种物品，组成了效应物群，以检验原子弹的冲击波、光辐射、放射性沾染的杀伤力和破坏力。因此，必须把原子弹投到靶心周围 100 米的范围之内，才能保证获得科学的数据。

1965 年 5 月 13 日 8 时 13 分 30 秒，当时我国最先进的轰 - 6 轰炸机飞上了天空。当飞机进入试验场区时，天气良好，蔚蓝的天空上点缀着几朵白云。很快，靶标出现在飞行员的视野内：方形的白框里套着一个直径约 200 米的白圈，白圈中央画着一个白色的“十”字。

机组人员摁下投弹按钮，减轻了重量的飞机轻轻向上一蹿，原子弹如利剑出鞘直扑靶标。

“轰隆隆！”一声巨响，天崩地裂。

6 秒钟后，排山倒海般的蘑菇云裹着巨大的冲击波汹涌而来！据雷达测定，原子弹在距靶心 40 米处爆炸。爆炸威力与理论计算的结果相一致。

从此，我国的原子弹开始真正成为可供实战使用的核武器。当天，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消息：我国在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试验。

从首次核装置试验成功到制成核航弹并空投试验成功，我国仅仅用了 7 个月的时间！

发给他一个一吨重的 勋章

在抓紧试验原子弹的同时，300万吨级氢弹的研制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从原子弹到氢弹，是一个质的飞跃。一位专家说：不能否认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借鉴了苏联的一些东西，但是氢弹的研制则完全是我们自力更生，从头摸索。

关于氢弹的研制，核武器研究院提出了一个从理论探索入手，做3次核试验，分3步走的氢弹攻关规划。为了获得试验关键点的数据，北京和上海的几十名科研人员开始在计算机上争分夺秒地进行计算。

那时的科研条件有限，计算带都是一摞一摞的，要用麻袋装。科研人员小心地查看每一条纸带，以保证每一个打眼都不破裂，否则就可能导致数据丢失。经过100多天的计算，试验关键点终于有了突破，整个氢弹研制工作就像冲出闸门的洪水，一下子驶入了快车道。

正在北京的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主任邓稼先马上赶到上海请大家吃饭。虽然只是每人吃了一碗阳春面，但年轻的科学家们还是感到十



邓稼先是我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被称为“两弹元勋”。

分惬意。

经过紧张的准备，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的零点时间定在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整。

当飞机进入空投区后，指挥员发出了清亮而有力的报时令：“……5、4、3、2、1，起爆！”

可是，半分钟后飞机仍在空中盘旋。原来，负责投弹的第一领航员极为紧张，竟忘记了按自动投掷器的按钮，以至于氢弹没能在预定的8点准时投下。

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随即指示罗布泊指挥所：“请告诉飞行员，要沉着冷静，不要紧张。”

飞到第三圈时，飞机投出了白色圆柱体的氢弹。氢弹在湛蓝的天空中拽着降落伞，摇晃飘落。突然，伴随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

成功了！在场的人们欢呼雀跃，激动得流下了热泪。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大当量氢弹爆炸，美国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苏联用了六年零三个月，英国用了五年零六个月，在中国之后进行氢弹试验的法国用了八年零六个月。

中国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就完成了从原子弹到氢弹的跨越，速度惊人，极为不易。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惊呼：中国在通向完全核地位的道路上前进的速度，又一次使西方专家大为惊诧。

毛泽东高兴地说：两年零八个月搞出氢弹，我们现在在世界上



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就完成了从原子弹到氢弹的跨越，速度惊人。

已是第四位。我们搞原子弹、导弹有很大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我们走自己的路，要发给他一个一吨重的勋章。

飞天，是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梦想。

飞天梦想成真

1957年10月4日，苏联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升空，由此拉开了人类

航天时代的序幕。

在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当听到代表们又一次谈到中国发展人造卫星这个话题时，毛泽东有些坐不住了。他扫视了一下会场，对大家说：近一段时间来，人造

卫星问题一直是大家关心的问题，我的心情也和大家一样。苏联在去年就把卫星抛上了天，美国在几个月前也把卫星抛上了天。我们怎么办？

毛泽东讲到这里，大手一挥，果断说道：“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话音刚落，所有与会者都站起来热烈鼓掌。

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到1965年，我国运载火箭技术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发射人造卫星的基本条件已趋于成熟。1965年1月8日，钱学森正式向国家建议：早日制订我国发展人造卫星的计划。

5月，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了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向中央呈送的《关于研制发射人造卫星的方案报告》，责成中国科学院负责拟订人造卫星发展规划。

从此，我国人造卫星研制工作全面展开。钱学森的建议是1965年1月提出的，因此研制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工程代号便定为“651”。

1970年4月2日，周恩来为准确掌握人造卫星研制的准备情况，将有关专家召集到北京人民大会堂，认真听取了钱学森等人关于研制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的相关情况汇报。

周恩来听得特别仔细，当听到弹道参数时，对几个参数在笔记本上进行了计算，然后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计算结果与设计指标差了几毫秒？”

汇报的专家大为惊讶，忙解释说：“对不起，是我把小数点后面的数字四舍五入了。”周恩来严肃地说：“各项工作一定要做到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历经 12 年风雨磨难，名为“东方红 1 号”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前的准备工作终于就绪。

1970 年 4 月 24 日凌晨，毛泽东批准实施发射。

21 时 35 分，“长征 1 号”运载火箭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喷出长达几十米的火焰，腾空而起。各地面跟踪测量台站接连报告：“捕获目标！”“跟踪良好！”“飞行正常！”“星箭分离！”“卫星入轨！”“工作正常！”……

“长征 1 号”运载火箭首次发射便一举成功。

全体工作人员尽情地欢呼、跳跃，互相拥抱，一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



“东方红 1 号”卫星的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的航天事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的信心。

21 时 50 分，国家广播事业局报告，接收到“东方红 1 号”人造卫星所发射信号播放的《东方红》乐曲，声音清晰洪亮。

4 月 25 日下午，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

各国驻华记者在第一时间以最快速度向本国报道这一重大新闻，惊呼中国航天技术发展神速，令人惊异，中国发射人造卫星是“轰

动世界的大事”。

“东方红 1 号”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独立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

名言金句

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邓小平

读党史 长智慧

面对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为抵制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核讹诈，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果断作出了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

在当时国家经济十分困难、技术基础非常薄弱、工作条件非常艰苦的情况下，邓稼先、钱三强、钱学森、程开甲等一大批优秀的科技工作者以身许国，忠心报国，怀着对新中国的满腔热爱，义无反顾地投身到研制“两弹一星”这一神圣而伟大的事业中来。

参与“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干部、工人、解放军指战员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用较少的投入和较短的时间，在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等尖端技术上实现了突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奠定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地位。

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是中国人民在20世纪

创造的新的宝贵精神财富，激励和鼓舞着一代代科技工作者。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当今世界，知识更新不断加快，社会分工日益细化，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青少年朋友正处在求学和成长的黄金时期，只有坚定报国之志，继承和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努力学习科学知识，提高内在素质，锤炼过硬本领，才能使自己的视野格局、思想观念、认识水平跟上越来越快的时代发展，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写给★
青少年的★
党史

六、为什么中国能在20世纪70年代
实现外交新突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是苏联。

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新中国充满敌意并对新中国进行封锁、遏制。一些亚洲国家，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对新中国也抱有怀疑和畏惧的心理。

从1953年7月朝鲜战争停战，中共中央提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方针后，中国的外交事业在各个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重返联合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20世纪70年代末，中美建交，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结束了两国长达30年的对峙。

由此，改革与开放比翼，中国与世界齐飞，中国成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世界发展的重要力量。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禁会问：为什么中国能在20世纪70年代实现外交新突破呢？

两位伟人的握手

毛泽东一生出过两次国，去的都是同一个国家——苏联。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开始了他对苏联的第一次访问。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的小会客厅里，两位伟人的手第一次紧紧握在一

起。

刚刚诞生的新中国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可能的武装干涉，又面临着恢复国内经济的艰巨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同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友好与合作关系显得格外重要。因此，毛泽东访苏的目的就是在两国平等的基础上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互助条约。



斯大林

然而，在毛泽东刚到苏联时，斯大林对签订新条约一事表现得很消极。

对此，毛泽东很生气，索性闭门不出。一天，苏方联络员和翻译来拜访，毛泽东大发脾气，说：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情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

一生不怕压、不信邪的毛泽东通过这种方式向斯大林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情绪。

毛泽东到访苏联，是新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与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直接会晤，国际舆论对此十分重视。在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后的10多天时间里，中苏双方重要的外交活动较少，加之苏联新闻机构很少报道毛泽东的情况，这自然引起了西方媒体的种种猜测。

英国通讯社报道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

苏联方面看到这则谣言后，一时有些紧张。斯大林急忙安排毛泽东到各地参观，并于1950年1月2日为毛泽东安排了一次答苏联塔斯社记者问。毛泽东借此机会在报纸上公开了访苏的目的。

恰在此时，缅甸、印度相继承认了新中国，英国也想承认新中国。

斯大林在这时认真考虑了毛泽东的意见，从而转变了对签订新条约一事的态度。

1月10日，周恩来率领庞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经过认真讨论和协商，两国政府于2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相关协定。



1950年，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到苏联整整两个月后，毛泽东于2月17日率中国代表团离苏回国。后来，毛泽东指出：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与外国政府签订的第一个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条约。它同100多年来旧中国

在屈辱的条件下与帝国主义列强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

这再次表明：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

广交朋友

到1950年，新中国已经同17个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其中既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也有亚洲新兴民族独立国家，还有北欧和中欧的国家。

1954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日内瓦会议。6月，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应邀访问印度和缅甸。在中印和中缅两国总理会谈的联合声明中，一致同意并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外交上这些可喜的变化，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和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右翼顽固分子的极度恐慌和切齿仇恨。

为了破坏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不惜采取最卑鄙的暗杀手段。

1955年4月，亚非29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首届亚非会议，讨论保卫世界和平、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等共同关心的问题。

4月11日，中国参加亚非会议的代表团乘坐包租的印度航空公

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飞离香港启德机场，前往印度尼西亚。5个小时后，飞机突然爆炸坠毁。

乘坐这架飞机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等8名中国代表团成员和3名外国记者不幸罹难。

原来，美帝国主义竭力破坏亚非会议，蒋介石的国民党特务机关竟以周恩来为目标策划政治谋杀，在中国代表团包租的飞机上安置了定时炸弹。

周恩来由于应邀出访缅甸，事先改变了出国路线，才得以幸免于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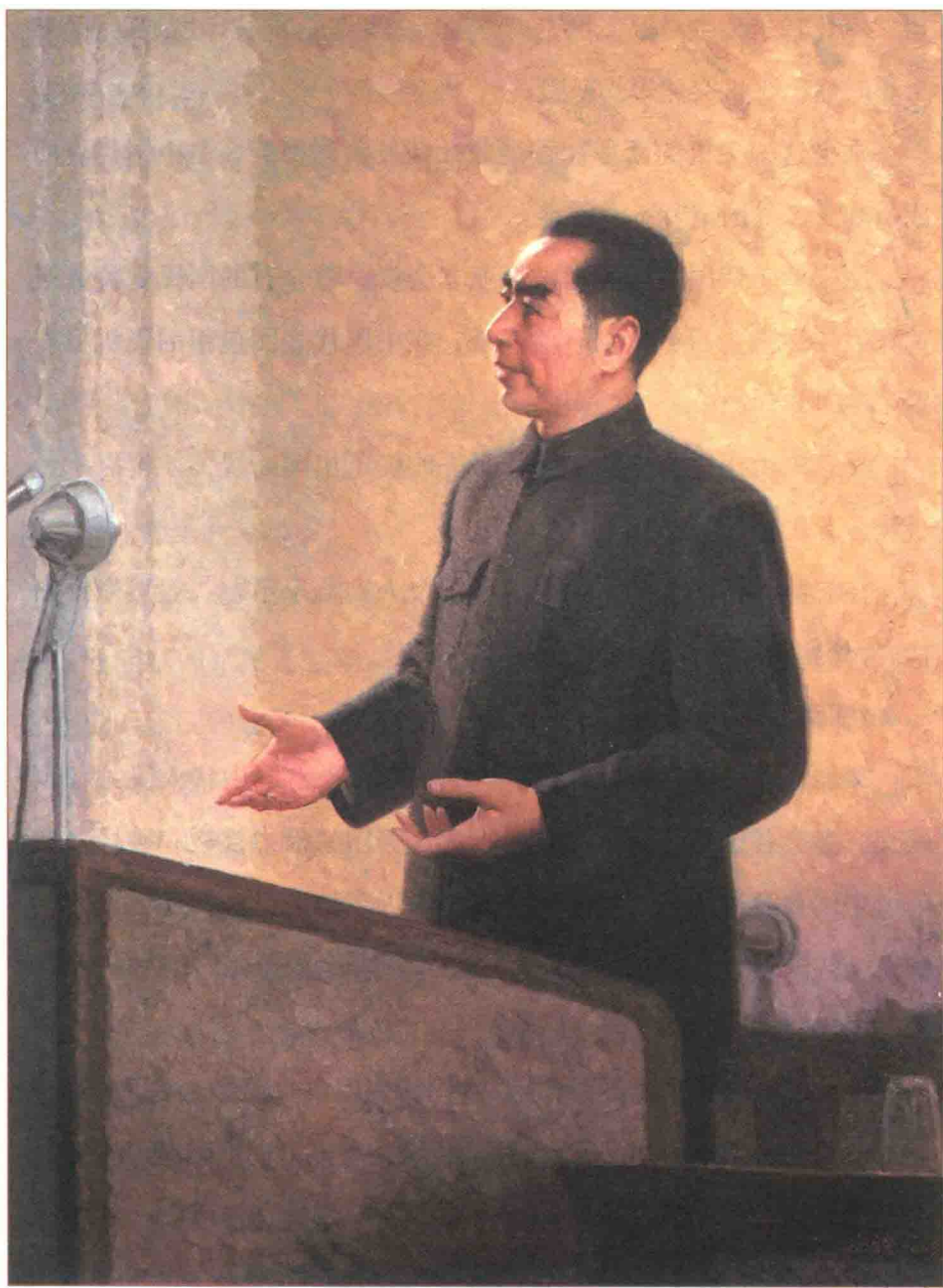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周恩来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毅然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万隆会议。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参加亚非会议的29个国家中，有22个没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参会各国的意识形态差异很大，美国又极力挑唆和破坏，造谣说中国要夺取亚非世界的领导权，对远东地区已经构成了威胁，致使一些国家对中国心存疑虑和恐惧。因此，会议开始时，猜忌横生，风波屡起。

针对这种紧张、复杂的情况，中国代表团审时度势、灵活应对。周恩来不愧为杰出的外交家，在开幕当天会议中出现不和谐声音时，他当机立断，把原来准备好的发言稿作为书面发言稿散发，利用短暂的休会时间口述了一份补充发言，并及时翻译出来。

在大会主席宣布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发言后，周恩来从容走



万隆会议之后，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图为油画《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靳尚谊画 中国美术馆藏）。

上讲台，第一句话就开诚布公地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接着，周恩来明确地提出了“求同存异”的原则，指出亚非各国“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所以，不同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存在，“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他呼吁各国撇开分歧，为了反对殖民主义的共同利益而加强团结合作。

周恩来的发言获得了绝大多数参会国家代表的赞同，大会的紧张气氛顿时缓和下来。

随后，中国代表团积极开展会外交往，与各国代表团举行广泛的谅解性会晤，推动《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吸收中国代表团的建议，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体现和引申。

万隆会议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亚非国家作为一支重要政治力量登上国际政治舞台，也标志着中国打开了与亚非国家广泛交往的大门。

中国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国际地位也日益提高。

重返联合国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国代表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正式形成。

194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下，董必武等中共代表随以宋子文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旧金山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在签署与会代表一致通过的《联合国宪章》时，中国代表按照5个邀请国名称的英文首字母顺序，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董必武的签字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舞台上打下的第一个珍贵印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资格理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接替。但是，美国顽固派坚持反华反共立场，通过操纵表决机器，让孤守台湾的国民党集团非法占据联合国席位，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排斥在联合国之外20多年。

20世纪60年代，虽然中苏关系出现了分裂，但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有40多个。20世纪70年代，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不断发展。仅在1971年，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就有15个。

在联合国的131个会员国中，亚非拉国家达99个，第三世界国家成为联合国中同美国抗衡的重要力量。

世界形势的变化迫使当时美国的总统尼克松对其全球战略进行调整。1971年7月9日，尼克松的特使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15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了基辛格来华公告。这份公告的发表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产生了积极影响。

然而，美国一方面与中国改善关系，另一方面又不肯放弃国民党政权，企图在联合国搞所谓“双重代表权”：既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又要保留国民党集团在联合国的席位。美国这样做实际上是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

对此，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还是那句话，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

1971年9月21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开幕。

当大会讨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问题时，美国继续推行“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政策，遭到了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强烈谴责。

会上，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的提案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国民党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从10月18日到25日，参会各国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25日，联合国大会第1976次全体会议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进行表决，最后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第2758号决议。

投票结果一宣布，会议大厅里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亚非拉国家的代表齐声欢呼，有的代表还随着有节奏的掌声和拍桌子声，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放声歌唱。

11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出席了联合国大会。团长乔冠华发表了震撼世界的演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舞台上扬眉吐气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小球转动大球

“小球转动大球”是对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工作的一个形象比喻。这里说的“小球”是指乒乓球，“大球”是指地球。

那么，小小的乒乓球怎么会转动庞大的地球呢？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因此而改变。

一方面，由于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淖不能自拔，尼克松政府在1968年提出了旨在收缩全球义务、调整国际关系的“尼克松主义”，有意改善对华关系。

另一方面，苏联领导人提出了旨在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内政的“勃列日涅夫主义”，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

针对国际形势的这一变化，毛泽东审时度势，提出了“反对两霸，侧重打击苏霸”的战略方针。

1969年12月初，美国驻波兰大使在时装博览会上见到几位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后，不顾外交礼节跑着追上中方人员，请求会晤中国驻波兰大使。消息传回国内，周恩来对毛泽东说：有门道了，可以敲门了。

1周后，在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中美两国大使进行了秘密谈话。美国大使向中国大使表示，尼克松总统有意改善中美关系。

1年后的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并让他一直站在身边陪同检阅国庆游行队伍。两人亲切交谈的大幅照片被刊登在各大报纸的显著位置。

1970年10月下旬，美国总统尼克松通过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总统向中方传话，希望派特使秘密访华。12月18日，毛泽东再次会见美国记者斯诺，并对他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

1971年3月末4月初，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中国乒协接受了本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组委会的邀请。中国乒乓球队在离开6年后重返国际乒坛。

世乒赛期间，中国乒乓球名将、3届世界冠军庄则栋主动送给美国乒乓球运动员科恩一件绣有黄山的刺绣，后者回赠了一件印有披头士歌名“Let It Be”的T恤。有记者问科恩是否愿意访问中国，他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愿意。”外国记者报道这件事的文章后来被国内《大参考》转载。

世乒赛结束后，中国乒协向美国乒乓球队发出访华邀请。尼克松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授意美国驻日大使：乒乓球运动员务必去北京。

消息传出，立即引起轰动。

4月10日，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

这就是当时被人们誉为“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它以出人意料的方式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和世界形势的变化。

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与周恩来进行了多次交谈。

1972年2月21日11时30分，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专机降落在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会见了尼克松，随后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图为油画《毛泽东会见尼克松》（马刚 画 中国美术馆藏）。

北京。尼克松第一个从舷梯上走下来，首先伸出手与周恩来握手。周恩来说：“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和我握手，25 年没有交往了啊。”尼克松感动地说：“我感到很荣幸，终于来到了伟大的国家。”

尼克松住进宾馆没多久，毛泽东就会见了。两人原定 15 分钟的谈话，结果谈了 65 分钟。

经过会谈，中美双方于 2 月 28 日在上海发表《中美联合公报》。这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正式开始。

八年后再次握手

1972 年，上海《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后，两国政府继续就建交问题举行会谈。

中国政府提出：要实现中美建交，美国政府必须断绝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从台湾撤出美国全部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废除同台湾签订的所谓“共同防御条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由于美国政府下不了正确处理这些问题的决心，因此两国虽然在 1973 年互设联络处，但两国建交一事被搁置下来。

1976 年，卡特成为美国新任总统。他一上任就开始着手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

1978 年 12 月，经过多次会谈，美方对中方关切的几个问题表

明了立场：承诺公报发表后美国将终止美蒋条约，撤销对台湾的承认，关闭美国驻台湾使馆并召回大使，一年内撤出一切军队和设施。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双方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宣布从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建交。

公报重申了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原则：“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中美关系中最关键、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美国方面表示：“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因为要与中国建交，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在国内面临很大的政治压力。国会的反对派中，有很多人对他的这一政策表示不满。考虑到中美建交一事还需要国会和美国民众的支持，卡特邀请邓小平访美，想借助邓小平的力量帮自己进行建交宣传。发出邀请后，邓小平同意了，回复的速度之快出乎美国人的意料，让卡特高兴得不得了。

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1月29日下午，卡特总统在白宫以接待国家元首的规格为来访的邓小平举行正式欢迎仪式。在白宫，邓小平的手和卡特的手紧紧相握，而此时距周恩来与尼克松第一次握手已有8年之久。新中国领导人对美国访问的破冰之旅，如巨人之手推开了中国的国门。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正开始探索对外开放、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互利共赢。

此时，距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仅 37 天，一个刚刚摆脱危难、冲破束缚的东方大国作出了历史性重大抉择，迈上了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这个抉择不但影响了远隔重洋的两个大国，更强烈地震撼着整个世界。

1979 年元旦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就是邓小平，标题是“邓小平，中国新时代的形象”。

名言金句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就是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

——毛泽东

读党史 长智慧

近代以来，旧中国在对外交往时所受的屈辱一再证明了“弱国无外交”的硬道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屹立于世界东方，掀开了外交的新篇章。

维护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两大基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安全和民族的尊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和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中国在外交上获得了更广阔的空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坚决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努力维护世界和平，赢得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尊重与赞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部环境的改善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独立自主，才能赢得平等交往。国与国如此，人与人亦然。广大青少年朋友正处在人生的起步阶段，未来的路还很长，在成长过程中，最关键的就是必须学会自立自强，既不要做自我封闭、足不出户的“宅男宅女”，也不要无原则地结交朋友；既不要当依赖父母辈的“啃老族”，也不要做只想向他人索取、不愿为社会作贡献的“巨婴”。我们要努力做有原则、敢担当、重情义的大写的人。

写给★
青少年的★
党史



七、为什么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如同遵义会议一样
开启了历史性转变？

1976年，是中国农历的龙年，也是中国社会激烈动荡、大起大落的一年。

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强烈地震，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

毛泽东逝世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结成的“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与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经过共同研究和反复商量，并征得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同意后，采取断然措施，宣布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的社会秩序得以恢复正常，党和国家的工作得以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10月14日，党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人们欣喜若狂，奔走相告，神州大地一片欢腾。

美酒飘香歌声飞，朋友啊请你干一杯。

胜利的十月永难忘，杯中洒满幸福泪。

十月里，响春雷，亿万人民举金杯，

舒心的酒啊浓又美，千杯万盏也不醉。

.....

这首曾经风靡全国的《祝酒歌》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后喜悦的心情。

“文化大革命”导致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温饱都成问题，国家建设百业待兴。党内外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奋起。

因此，欢欣鼓舞之后，人们开始反思：怎样尽快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得到快速发展？

“两个凡是”铸成 思想枷锁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两个凡是”客观上是在维护“文革”，维护“文革”时期的一系列错误决定、错误决策。所以，“两个凡是”一经提出，就遭到了质疑和反对。

1977年4月，“两个凡是”刚提出不久，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在给党中央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此后，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批评“两个凡是”，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走出“两个凡是”误区、开辟思想解放道路的先导。叶剑英、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等老一辈革命家也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抵制“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由于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了卓越的历史功勋，邓小平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粉碎“四人帮”后，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下，1977年7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邓小平复出后，主动要求分管教育科学工作。在他的努力下，“文化大革命”中被废弃的高考制度得到恢复。虽然党中央作出恢复高考的决定时已过了通常举行高考的7月，但为了早日选出人才，将1977年的高考放在当年冬天举行。在那一年冬天，全国570万考生走进了被关闭长达10年之久的高考考场。虽然按照当时的办学条件，这次高考只录取了不到30万人，但是高考制度的恢复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重新拿起书本，加入求学大军中。

1977年高考筹备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会令今天的青少年感到难以置信的事：由于报名参加高考的人数大大超过了预期，以至于全国一时竟然拿不出足够的纸来印



恢复高考后，在北京图书馆里埋头苦读准备高考的青年。



1978年的春天，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图为油画《科学的春天》（丁一林 画 中国美术馆藏）。

刷试卷！最后，中共中央决定紧急调用原本用来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才使这一问题得到及时解决。

1978年春天，27.3万名77级大学新生满怀憧憬地开始了大学生活。1978年夏天，610万人参加高考，录取40.2万人，78级新生于秋季正常入学。相隔半年，两度招生，中国高等教育由此迎来了生机勃勃的春天。

1978年春天，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会上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并指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从而纠正了多年来对知识分子的



“左”的政策，使科学、教育、文艺等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受到巨大鼓舞。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急切地期待中国迅速摆脱困境，迈开大步向前进。但是，由于受到“两个凡是”方针的限制，拨乱反正步履维艰，党和国家的工作出现了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人们开始认识到，要彻底扭转“四人帮”造成的思想混乱的局面，就不能不首先解决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判定真理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于是，一场关于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的争论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一篇文章引发全国大讨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刊发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的文章。文章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

这篇文章从根本上否定了“两个凡是”，可谓石破天惊。文章一经发表，便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然而，这篇文章的产生和发表，却冲破了不少阻力，凝聚了很

多人的心血和智慧。

早在1977年10月9日，叶剑英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的讲话，强调指出：我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时，一定要提倡融会贯通，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有的放矢。于是，一些理论工作者开始酝酿就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撰写文章，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模糊认识。

胡福明，时任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在“两个凡是”提出后不久，他就敏锐地觉察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都曾按照实践的变化修改自己的观点，如果按“两个凡是”办，中国的前途将不堪设想。

但是，“两个凡是”打着“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子，又是当时最高领导人圈定的，公开发表直接批判“两个凡是”的稿子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从批判林彪的“天才论”、“句句是真理”和“一句顶一万句”等唯心主义理论入手，以此为“替身”和靶子，选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为理论武器，揭露“两个凡是”的错误本质。

7月上旬，胡福明的妻子生病住院。他白天在讲台上授课，晚上到医院陪床。盛夏时分的南京城异常闷热。每晚去陪床的时候，胡福明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等著作带到医院。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借着走廊的灯光看书，还不时拿笔摘录。就这样，在妻子出院后不久他就完成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初稿，并于9月初寄给《光明日报》编辑部。

巧合的是，几乎就在同时，远在北京的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

室的孙长江也撰写了一篇这方面的文章。于是，光明日报社的总编辑杨西光决定把两篇文章合在一起，以胡福明的文章为基础，进行大的修改完善。

杨西光明确提出：

文章的修改要坚持解放思想、批判“两个凡是”、冲破思想禁区的原则；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突出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唯一性。同时，他又



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胡福明被表彰为“改革开放杰出贡献100人”。

与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系，希望能及时转发、转播这篇文章，以形成更大的舆论声势。其中一家媒体的主要领导人表示：这么重要的文章最好能请一位权威人士审阅，这样转发起来就更方便了。

当时，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理论动态》每一期的文章在刊发前都要送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审阅。于是，杨西光就把这篇文章列入《理论动态》清样中。胡耀邦在审稿时改了一个字，改了一个标点，然后画了一个圈，同意发表。

1978年5月10日，这篇文章先由《理论动态》刊发；次日，《光明日报》刊发了这篇文章。

一石激起千层浪。5月11日下午，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这篇文章；第二天，全国主要报纸纷纷转载。广大干部群众开始关注真理标准问题并展开讨论。

然而，由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同“两个凡是”尖锐对立，并且触及盛行多年的思想僵化和个人崇拜现象，因此受到一些领导人的强烈指责。刚刚开始的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面临巨大的压力。

在关键时刻，邓小平对这场讨论给予了及时有力的支持。

在1978年6月2日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对这篇文章的观点公开表示支持，并严厉批评教条主义，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

此后，《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纸连续发表文章，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以不同方式支持或参与讨论，中央各部门、地方和军队的负责人相继发表讲话或文章予以支持，理论界、学术界、新闻界更是踊跃参与讨论。

由此，全国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1978年9月，在已是瑟瑟秋风寒的东北平原上，邓小平一路视察，一路发表讲话，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用他自己的话讲是“到处点火”。

邓小平呼吁：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

一些。

在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过程中，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始终着眼大局，坚持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这场讨论的落脚点，通过讨论引导人们反思过去、思考未来。

事实上，真正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不是这篇文章本身，而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一次思想大解放。它将人们从迷信、僵化的状态下解放出来。我党也从此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焕发勃勃生机。这次大讨论是改革开放的前奏，为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思想基础。

实现历史性转变的 重要会议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召开过很多次重大会议，有两次会议因其扭转危局、意义非凡。

一次是遵义会议。从这次会议开始，逐步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次会议也因此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一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事实上，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只开了5天，而在它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却历时36天。两次会议的间隔时间仅为两天，可以说是准备充分、衔接紧凑。

1978年11月10日，深秋时节的首都北京迎来了党、政、军200多位领导人，中央工作会议在位于北京西郊的京西宾馆开幕。

走进会议大厅的人们神情严肃，他们中有很多是饱经革命沧桑、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迫害的老同志。虽然窗外寒气袭人，但通过会前交谈和感受会场氛围，参会代表们隐约感觉到了春天的气息，预感到一个重要时刻即将到来。

这次会议本来是要讨论经济工作的，然而陈云在会议分组讨论时的发言却使会议改变了原定议程。

11月12日，陈云在参加东北组讨论时率先“放了一炮”。他向中央郑重提出，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必须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首先要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冤受屈的同志予以平反。

陈云的发言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开展以来党内思想交锋的成果和迫在眉睫必须解决的问题摆在了桌面上。他的发言被编成简报全文刊出后，立刻引起与会代表的强烈反响。与会代表纷纷发言，对陈云的提议表示赞成并加以发挥。会议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由此，整个中央工作会议逐渐离开事先设置好的轨道。

邓小平因11月5日出访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3国，11月14

日才回国，所以没有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开幕会。回国后，他很快把注意力放到会议上，发表了一系列讲话，推动会议转向正确方向。

在与会代表的强烈要求下，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案等错案平反的决定，解决了一批重大历史遗留问题，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

根据会议进展情况，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放手让大家讲话。会场民主气氛浓厚，大家畅所欲言，对许多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使这次会议成为一次久违了的真正的民主会议。

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邓小平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



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分组讨论时的发言，使会议改变了原定议程。

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在经济政策上，邓小平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本来13日举行完闭幕会，中央工作会议就应该闭幕了。代表们认为邓小平的讲话非常重要，纷纷要求延长两天进行学习和讨论。这样，直到12月15日，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才真正落下帷幕。

12月18—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只召开了5天时间，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次会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及时果断地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取得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成果；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

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



参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邓小平

亲历这次会议的女服务员张丽华至今清楚地记得，“那天，会场里坐得满满的，人和人挨得很近。放眼看去，似乎只有黄色军装和蓝灰两色的中山装”。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场服务的张丽华，拎着大暖瓶守候在会场外。每次给邓小平续水的时候，张丽华都会发现他杯子里的水比较少，“他讲话多，喝水自然多一些”。

当时，张丽华并没有意识到这次会议和以前的会议有什么大的不同。但很快，她就体会到了这次会议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女服务员可以烫头了，上班的时候穿的工作服悄悄换成了漂亮的套裙，下了班可以穿时装了……

名言金句

我们真正的转折点是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实际上制定了新的纲领、方针和政策，制定了新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邓小平

读党史 长智慧

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是中国共产党能够一次次从困境中奋起的根本原因。

1935年的遵义会议，是在中国革命形势处于低谷、党和红军处于险境的危急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和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形势处于低谷、党和国家工作处于停滞徘徊状态的紧急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新的纲领、方针和政策，推动党和国家开始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如同遵义会议一样是党的历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全面拨乱反正，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都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探索。

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也是我们青少年健康成长、不断进步的必由之路。青少年正处于求学阶段，犯点儿错误在所难免。面对错误，只有多从自身找原因，接受教训，知错纠错，才能走出错误，健康成长。从某种程度上说，青少年就是在不断试错中学习成长的。青少年必须积极、自信地面对成长中遇到的挫折和困惑，以直面问题的勇气、纠正错误的决心，正确对待错误，虚心接受批评，不断将自己的人生提升到新高度、新境界。

请记住：不重复犯错，错误就成了成长的助力。

写给★
青少年的★
党史

八、为什么说小岗村农民的创举拉开了
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农业大国。关于农业的重要性，自古以来就有“无农不稳”和“无粮则乱”的说法。所以，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问题。

这样一个关系到国家发展的“关键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末因为一个小小村落的18户农民的一项创举，有了新的解决方案。

这个小小村落就是小岗村。18户农民的创举就是“包干到户”。此后，随着亿万农民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小岗村农民的创举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小岗农民勇闯禁区

小岗村隶属于安徽省凤阳县。

之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凤阳县就名扬四方，一是因为这里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故乡；二是因为这里有一种集曲艺和歌舞为一体的传统民间表演艺术——凤阳花鼓；三是因为这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灾荒不断，人们四处讨饭。

有一首流传很广的凤阳花鼓这样唱道：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牛羊，小户人家卖儿郎。

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小岗村的农民翻身做主人，分得了土地，开始了新生活。但是，由于底子薄，他们的日子过得依然紧巴巴。特别是1957—1977年的20年间，小岗村和中国大多数其他农村一样，历经“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农民劳动积极性受到摧残，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农民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

当时，梨园公社是凤阳县最穷的公社，小岗生产队又是这个公社中最穷的队，是名副其实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

知道返销粮是什么吗？就是国家在农民上交公粮后，根据情况再向受灾或贫困落后地区返销的粮食。

种粮食的人却要靠国家返销才能有粮吃，由此可见小岗村当时有多么贫困落后。

“新中国成立后23年从来没向国家交过余粮。”小岗村纪念馆里的介绍文字这样写道。

从1960年开始，小岗村的很多人出去要过饭。老年人和刚能走动的小孩出去要饭，还有人同情；年轻力壮的去要饭，往往被人说是懒汉。要饭的日子不好过啊！

于是，关于怎么做才能不去要饭的讨论开始在村民间私下里进行。“如果分田给我们，我们肯定能吃得饱，至少不用出去要饭了。”有这种想法的人越来越多，但具体怎么弄，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办法。

因为那个时候，“批资本主义”“割资本主义尾巴”“斗私批修”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想光明正大地搞分田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1977年6月，中央决定由万里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经过深入农村调查了解实际情况，安徽省委于11月正式下发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主要内容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落实按劳分配制度；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正当的家庭副业；搞好农村经营管理，允许生产队根据不同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

这份文件使小岗人看到了农业政策改革的希望。

1978年夏秋之交，安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大批农民背井离乡外出乞讨。在严峻的形势下，安徽省委决定借给每个农民3分地种菜度荒，所产粮菜不征购、不计口粮。这一应急性措施立即将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各地出现了全家男女老幼齐下地的忙碌景象。



小岗村的创举，开创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先河。图为油画《1978年11月24日·小岗》（王少伦 画 中国美术馆藏）



在此背景下，小岗生产队的一些社员大胆提出：1961年遇到自然灾害时搞责任田，救了不少人的命，今年又是大旱，不分田到户恐怕会死人的。严宏昌、严俊昌和严立学3个队干部商议后一致认为：小岗已经穷到家了，快揭不开锅了，再不分田到户就没办法了。

1978年11月24日夜，小岗村西头严立华家低矮破旧的茅草房里，挤满了18户农民的代表。一次关系全村人命运的秘密会议召开了。

大家聚在这里，就是研究和决定究竟是捆在一起继续受穷，还是另谋生路、分田到户。

有人提出：分田出了事谁负责？

是啊，在那个年代，搞分田到户，后果很严重，可能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帽子挨批判，甚至被划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送进监狱。无论哪种结果，想想都令人不寒而栗。

为带领小岗人闯出一条生路，队长严俊昌冒着身败名裂的巨大风险，决定分田到户，并与大伙定下两条规矩：

第一，夏、秋两季打的头场粮食，该交国家的

交国家，该交集体的交集体，剩下的归自己，任何人不准装蒜。

第二，我们是明组暗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对上级和队外任何人讲，谁讲谁就是与全村人为敌。

对此，大家异口同声表示同意，并说如果队干部为此蹲了班房，全队社员共同负责把他们的孩子抚养到18岁。

有人提议：口说无凭，要立字据。于是，副队长严宏昌执笔写下了这样一份责任书：

1978年12月，地点：严立华家。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鉴（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刹（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到会的18户农民的代表在责任书上庄严地按下了鲜红的手印。

值得一提的是：签订这份责任书时，严宏昌把时间误写成了12月，还有两户单身汉外出逃荒，由到会的亲属代替按了手印。

这一天，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还有24天。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他们的这一创举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先河。

历史的转折有时很自觉，有时又不那么自觉，但无论自觉与否，历史的发展自然有其规律。如今，这份按着小岗村18户普通农民代表“红手印”的“生死契约”被存放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成了一份宝贵的文物，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改革的见证。

“三靠村”变成 “冒尖村”

签订土地承包责任书后，小岗只用几天时间就分了田，全队 500 多亩地，20 户 115 人，每人分到 4.5 亩地。同时，将国家粮食征购任务、集体还贷任务、公共积累、各类人员的补助款项等按人头承包到户。包干任务完成后，剩多剩少归自己。

这种“包干到户”的全新责任承包形式，一举打破了农业生产管理上统得过死的“大呼隆”和分配搞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释放了农村生产力。

1979 年，小岗迎来了一个丰收年。当年，全队粮食总产量为 6.65 万公斤，相当于 1955 年到 1970 年粮食产量的总和；收获油料 1.75 万余公斤。



“包干到户”这一全新的责任承包形式，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释放了农村生产力。

这一年，小岗人不但没吃国家供应粮，而且破天荒地向国家上缴了 3.25 万公斤粮食、油料 1 万多公斤。

这一年，全队农副业生产总收入达 47000 多元，小岗人均收入 400 元，第一次归还了国家贷款 800 元。

这一年，小岗第一次为生产队集体留储备粮 500 多公斤，留公积金 150 多元。

这一年，小岗收入最多的一户总收入达 5000 多元，全村平均每人收入达 700 多元，收入最少的一户平均每人收入也在 250 元左右。

通过“包干到户”，小岗人依靠自己的双手迅速解决了多年不能解决的温饱问题，昔日的“三靠村”也一跃成为“冒尖村”。

粮食丰收了，生活改善了，小岗人的脸上挂满了笑容，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新生活 and 旧日子一对比，大家都感慨地说：“大呼隆”干了 20 年，却越干越穷，什么招都用过了，就是治不好我们队的“穷病”，如今包干到户一年就治好了。于是，有人编了顺口溜：

大包干就是好，干部群众都想搞；
只要搞上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
个人富集体富，国家还要盖仓库。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小岗包干到户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在周围地区引起了不小的骚动。看着小岗人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梨园公社乃至凤阳县的其他生产队也不甘落后，纷纷开始效仿小岗的做法。

到1979年底，凤阳县有1/3的生产队偷偷搞起了包干到户，全县粮食总产量比历史最高水平增长了近1倍，调出粮食超过此前26年的总和。

与此同时，在万里的指示下，安徽省委在肥西县山南公社公开进行了包产到户试验。到1979年秋，肥西县97%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全县当年向国家交售公粮比1978年增长近3倍。

凤阳和肥西两县改革的成功，推动了安徽省其他市县的改革。很快，安徽省包产到户遍地开花，粮食产量屡创新高。由此，“要吃米，找万里”的民谚风靡安徽，传遍全国。

在安徽的影响下，四川、贵州、甘肃等省纷纷放宽农村政策，推进农村承包责任制改革。

一号文件一锤定音

然而，由小岗开启的中国农村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读者来信。信中说：“轻易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编者按中写道：已经出现包产到组和分田到组的地方，必须坚决纠正。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对党报是格外关注的。一时间，率先进行改革的农民的思想产生了波动。

紧要关头，安徽省委表明立场，支持改革，并针锋相对地组织撰写了题为《正确对待联产责任制》的文章，在3月30日《人民日报》显著位置登载，对“包产到组”和“联系产量评定奖惩的责任制”给予了积极评价。

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农村劳动组织“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

这里的“可以……可以……也可以”为广大农民在实践中创造新经验、进行大胆尝试留下了空间，使农村干部看到了体制改革的希望。但是，这份文件也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这是因为：对于农村出现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责任制形式，从20世纪50年代到“文化大革命”一直被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所以，当时党内外很多人心存疑虑，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偏离社会主义的方向。

这份文件下发后，面对外界越来越紧的风声，小岗人感到恐慌，更觉得憋屈和不解。

1980年1月，就在小岗人彷徨无措时，一位大人物忽然造访了小岗村。他就是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经过实地考察，万里对以小岗为代表进行的改革尝试和创造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向小岗人表示：

现在好了，马列主义竟出在你们这小茅草屋里了。你们干得好，能完成国家的，留足集体的，社员生活水平能提高。这是对国家有利，对集体有利，对你们个人也有利的事。哪个再说你们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搞社会主义，这个官司交给我万里给他们打好了。

对于从安徽兴起的农村改革以及由此引发的思想分歧，邓小平一直比较关注。在多次听取汇报和看了大量材料后，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思想认识能否统一将决定农村改革的成败；农村改革成功与否又将直接影响中国改革的大趋势。

关键时刻，邓小平以超凡的胆识果断拍板，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农村改革做法给予积极的肯定和明确的支持。

1980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再次明确表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他强调：“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

邓小平的明确表态和坚定支持，对于打破当时人们头脑中普遍存在的僵化思想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9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文件，在强调进一步搞好集体经济的同时，指出：“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

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

这是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件。它第一次将“包产到户”堂而皇之地写进中央正式文件，并给予积极的、正面的、肯定的评价。它第一次为多年来被当作资本主义批判的“包产到户”正了名，使这座改革先行者偷偷走的“独木桥”变成了推进中国农村改革的“阳关大道”。

从此，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自发实践、初步推广阶段进入全国大发展阶段。

1981年，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万里责成国家农业委员会起草一份关于农村工作的文件。经过中央书记处几次讨论审查，这个文件最后通过时已经是1981年年底了。因为来不及年内发出，只好作为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发出。



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和农业、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民的生活也富裕起来。

尽管这个文件成为“一号文件”有点偶然，但对渴盼中央认可农村改革的广大农民来说，这个文件的发出，是中央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一个重要信号。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一锤定音：今后，在农村工作方面，每年要搞一个战略性文件，下次还要排“一号”。

这个中央一号文件名为《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文件旗帜鲜明地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至此，农村改革的骏马开始在希望的田野上尽情驰骋。

随着农村改革的全面铺开，农村经济搞活了，农民生活富裕起来了，对城市的农产品供应也因此大大改善。全国人民看到了繁荣昌盛的希望，改革开放热情被大大调动起来。

1984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的盛大游行。当一支农民游行队伍高抬着写有“联产承包好”5个大字的巨幅标语走过检阅台时，广场上欢声雷动，人们纷纷为因改革开放而焕发活力的中国农民喝彩。

名言金句

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

——习近平

读党史 长智慧

毛泽东曾经说过：“政策与策略是党的生命。”

正如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一样，由小岗开启的中国农村改革被誉为“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推动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由“大包干”催生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中国农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项伟大创新。

改革开放前，“大呼隆”和“大锅饭”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阻碍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民连温饱都难以解决，集体经济成为“空壳”。1978年，小岗村18户村民以“托孤”的形式立下生死状，按下“红手印”，搞起“大包干”。

他们的创举如一声惊雷，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

这一声惊雷化作浩荡东风，使中国农民摆脱饥饿，推动中国农村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40多年来，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国家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和

特产税，到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社会主义新农村变得越来越美丽！

40多年来，当年“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大包干精神”经过不断丰富，逐渐沉淀和凝练为“敢于创造、敢于担当、敢于奋斗”的“小岗精神”，并随着改革的不断向前而历久弥新、熠熠生辉！

越是伟大的事业，越是需要敢闯敢试的精神和开拓创新的勇气。

青少年朋友，你们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希望所在，更应把开拓创新作为一种常态，敢挑最重的担子，敢啃最硬的骨头，敢于攀登时代的高峰。

写给★
青少年的★
党史

九、为什么说创办经济特区是对外开放
的重大突破？



古希腊哲学家阿基米德曾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创办经济特区无疑就是撬动原有体制、谱写经济发展新篇章的最重要的一个“阿基米德支点”。

在深圳博物馆门前矗立着这样一尊雕塑：一位巨人张开双臂，奋力撑破门框，摆出身陷困境仍然向前冲杀的姿势。

这是一尊寓意深刻的雕塑，是经济特区突破重重阻力、杀出一条血路的开拓精神的集中体现，同时也反映了把对外开放确立为基本国策并付诸实践的曲折前进过程。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见证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从闭关自守向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转变。

中国则从创办经济特区起步，最终形成了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象征深圳开拓精神的巨人雕塑

走出国门看世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禁运和军事包围政策，妄图扼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生的人民政权。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不得不在政治和经济上实行“一边倒”的政策，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经济贸易关系。然而，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两国间的经贸往来中断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极“左”思想指导下，人们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绝对化，拒绝学习和利用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拒绝接受外国的经济援助和贷款。受“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思想的影响，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方法被认为是“崇洋媚外”，引进外资和与外国的正常贸易被认为是“投降卖国”，甚至从事对外经贸的干部被说成是“叛徒、特务和洋奴”。

就这样，在20世纪60—70年代，中国错失了10多年的发展良机。粉碎“四人帮”后，人们通过横向比较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近30年的奋斗不仅没有实现“赶英超美”，反而被西方发达国家甩得越来越远，甚至被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甩在了后面。

“中国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这是刚从十年内乱中走出来的中国人的深切感受。

痛定思痛，中国人逐渐认识到：关起门来搞不成现代化建设，中国的国门必须打开！

1978年上半年，为了学习借鉴外国经济建设和经济管理的先进经验，一个又一个考察团被党中央派往国外。

5月2日—6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一个高级代表团，历时5周，行程2万多公里，先后访问了法国、西德、瑞士、丹麦、比利时5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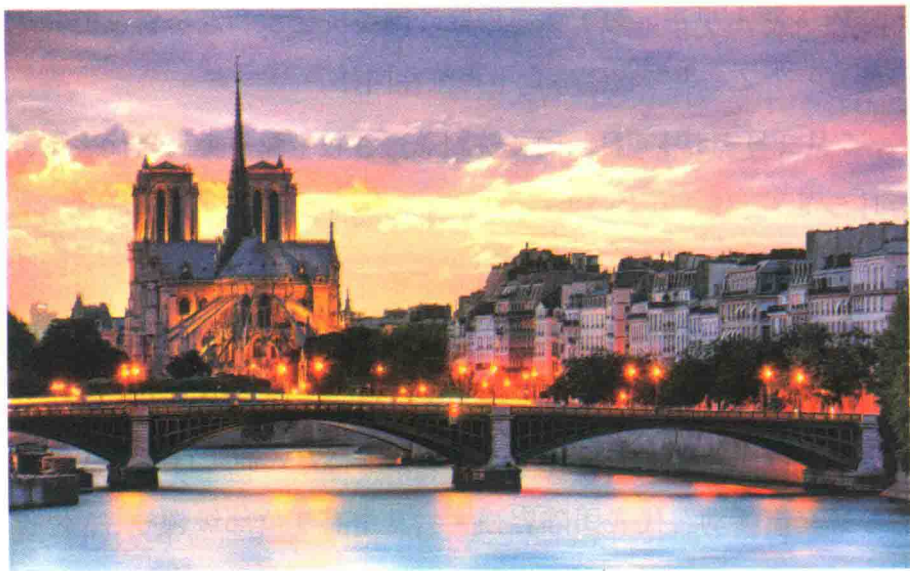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政府经济代表团。这次访问不是一般的外事访问，而是中国为了解西方经济发展情况、探索中西方经济技术合作新方式而进行的一次重要的考察交流活动。代表团阵容强大，其中有3位部级领导、3位省市级领导，共计20多位中央和地方干部，而且他们都是负责经济工作的。

临行时，邓小平专门在北京饭店对代表团一行人讲：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什么都看，他们成功的要看，他们失败的也看，究竟这个是什么样的世界，现在发展情况怎样，至少你们心里能够清楚。

代表团出访后，受到出访各国的高度重视和高规格礼遇。

第一站，法国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代表团、主持会谈，并就扩大双方贸易问题发表了意见。在比利时、丹麦，两国首相亲自迎接代表团并主持会谈，比利时国王和丹麦王后还在王宫内设宴款待了代表团。在西德，双方就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访问中，对我方提出的各项参观要求，各国都做了周密安排。出访各国的工商界人士都争着同我代表团接触，表示希望中国很快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西欧发达国家正处于经济萧条时期，对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非常感兴趣。

强大起来，愿意同我国在政治上发展合作，在经济上扩大贸易往来和科技合作与交流。代表团尚未回国，法国巴黎国民银行就派人赶到北京，提出了为我国提供 25 亿美元贷款的计划。

可以看出，处于经济萧条时期的西欧发达国家急于为其过剩的资本找出路，对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非常感兴趣。

通过访问，代表团也看到了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

比如：当时这 5 个国家乃至整个西欧已经形成一个高速公路网络，而我国的高速公路是零公里。出访以前，代表团的个别成员听说过“高速公路”这个名词，但高速公路究竟是个什么模样、车辆在上面行驶会快到什么程度，他们也说不清楚。

代表团成员一边参观访问，一边思考着我们应该如何学习借鉴。

代表团回国后，6月30日下午，中央政治局专门听取了代表团的汇报。这个会开得时间很长，从下午3点30分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

谷牧主要谈了3点意见：第一，二战后西欧发达国家的经济确有很大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我们已经落后很多。第二，这些国家由于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商品要找销路，都非常重视



谷 牧

与中国发展经济贸易交往。第三，国际上补偿贸易、合作生产、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等通行的办法，我们可以研究采用。

听了汇报，到会的中央领导同志都表示：该是下决心采取措施实行对外开放的时候了。不久，国务院召开了一个关于加速四化建设的务虚会。会上，与会成员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认真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梳理了各代表团出国访问的成果，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利用国外资金、大胆进入国际市场等一系列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这些成果最终都凝聚到当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伟大战略决策之中。

开放从蛇口突破

中国要对外开放，应该从何入手呢？邓小平认为：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

中国这么大，选择在哪里进行试验呢？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突破口选择得好，将顺利打开国门，坚定人们对外开放的信心；选择得不好，将难免引起人们对对外开放政策的怀疑和忧虑，直接影响对外开放战略部署的推进。

对于这个突破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选择得非常慎重。

1979年1月6日，广东省、交通部联合向国务院报送《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收到报告后，立即与谷牧副总理进行了认真研究，决定请交通部部长彭德清和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袁庚前来当面商议。

中国招商局是李鸿章于1872年建立的。抗日战争时期，它的总部设在香港。1950年1月，招商局驻香港的13条轮船起义，回到祖国怀抱，香港招商局从此成为交通部驻香港的代表机构，历任交通部部长都兼任香港招商局董事长。

1月31日，正值大年初四，彭德清部长和袁庚副董事长来到了中南海李先念的办公室。

袁庚胸有成竹地谈了自己的想法。当他说到要把香港充足的资

金、先进的技术 with 内地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结合起来时，李先念插话道：“对，现在就是要把香港和内地的优势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外资来搞建设。不仅广东要这样搞，福建、上海等地都可以考虑这样搞。”

袁庚又说：“我们想先行一步，要求在蛇口划出地段，作为招商局的工业用地。”李先念看着广东省宝安县地图，指着深圳西南角的蛇口说：“就给你这个半岛吧！”

2月2日，按照中央的部署和邓小平的意见，谷牧召集相关部门负责人，召开了一个特别会议，商议和决定了新中国历史上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上为一个驻港企业划出20公顷土地，并给予特殊政策，允许其按照香港方式经营。

袁庚在会上明确表示：“这个工业区的建设不用财政部1分钱，只要求财政部免税10~15年，以后全部交给国家。”

7月，已是火热的夏天，蛇口工业区便在此时开工建设。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大棋局中，蛇口工业区先行了一步，而中国的国门也由此打开。

蛇口工业区一成立就率先打破国营制度的“大锅饭”，实行全新的社会经济管理体制，并第一次按照国际惯例引进外商和外资。

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窗口”，蛇口工业区还诞生了许多突破旧思想束缚、催人开拓奋进的新口号，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招商局副董事长袁庚到香港做的第一单生意是买一座大楼，首期订金2000万港币，讲好星期五下午两点交付。那天下午，办完交

易手续后，支票一交到香港商人手上，就有两个职员迅速接过支票，以最快的速度跑步下楼上车，争分夺秒地赶往香港汇丰银行。

原来，第二天是周末，银行要关门。如果不在周五当天存款，香港商人就会损失 2000 万港币 3 天的利息。为此，香港商人还准备了两部车，以防途中车辆熄火误事。这件事对袁庚触动很大。“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从此印进了他的脑海。

另一件事发生在蛇口工业区码头工程建设过程中。起初，由于采取惯用的平均主义奖励办法，工程建设进展缓慢。为了调动工人的积极性，蛇口工业区推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这一制度激励效果明显，中期工程比原计划提前 1 个月完成。但是，这种奖励制度不久便被上级有关部门勒令停止实行。工人生产热情严重受挫，施工进度迅速下滑。袁庚向中央领导提出申诉，强调“效率就是生命”，最终恢复了定额超产奖励制度，而“效率就是生命”这句话就此流传开来。

后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口号被写在广告牌上，竖在蛇口工业区的一个繁华路口。这一曾被邓小平多次提起的口号，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诞生于 1979 年蛇口工业区的口号被誉为“冲破旧观念的一声春雷”。

杀出一条血路来

就在中央同意招商局在蛇口办工业区的同时，广东省委也在考虑如何利用广东的特殊条件，积极探索扩大对外开放，让广东发展得更快一些。

1979年1月，广东省委在传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时，有的领导提议：广东应当拿出一个地方对外开放，最好从汕头开始。汕头有海港，又是重要的侨乡，容易发展经济；而且地理位置偏，即使出点问题影响也不大。广东省委为此开会进行了研究，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认为：要搞就全省搞，除了汕头外，紧邻香港、澳门的宝安和珠海也可以同时开发。

1月23日，广东省决定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并将这一决定上报了中央。3月5日，这一决定获中央批准。

此时的深圳还只是南国边陲的一个小渔村，与香港之间只隔着一条深圳河，但当时在经济上却与香港有着天壤之别。1978年，深圳农民人均收入为134元人民币，而对岸香港新界农民人均收入是13000多港元。巨大的经济反差引发了当地老百姓“用脚投票”——有很多人偷渡到香港。

对此，广东省委认识到：单纯“堵”不是办法，只有想办法把经济搞上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深圳河两边出现巨大经济差距的原因主要是香港能够放手利用国际资本。广东要发展，必须采取特殊政策，扩大对外开放。

1979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记习仲勋在向中央汇报工作时提出：广东要搞好，得多给点自主权，要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外国厂商来投资办厂，或兴办合营企业等。

邓小平认真听着汇报。此前，他就在思考：改革开放，需要找一个试验场，放手搞，万一失败也不要紧，就那么一小块地方嘛！此时，听了习仲勋的汇报，他发现自己的想法与广东省委不谋而合，思想的火花刹那间迸发。邓小平语气坚定地说：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出来，搞一个特区怎么样？过去陕甘宁不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广东省委最初只是想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对外开放，而邓小平却更大胆地提出建立特区。一个伟大的决策就这样诞生了！

在这次会上，福建省委也提出要搞对外开放。7月，中央确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4个城市试办出口特区。第二年5月，中央正式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兴办经济特区的有关法律法规。

至此，从创意、构想到党中央作决定、政府出台法规，最后到人大立法，经济特区的成立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现实。

“杀出一条血路来！”

这句话在战争年代和在经济建设时期显然指的不是一回事，但相同的是，都需要一往无前的勇气和敢闯敢试的胆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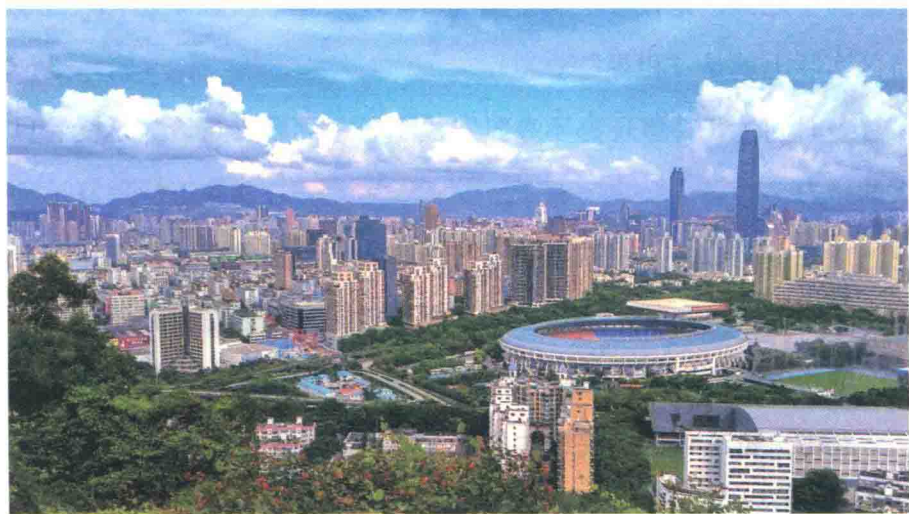
创办经济特区的大政方针一经确定，一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建设就迅速在深圳拉开序幕。

一声令下，从人民解放军抽调来的基建工程兵两个师的官兵风驰电掣般赶到深圳，加入特区拓荒者的队伍中。100 多位工程师身背行装，来到深圳。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百万劳务大军如浪潮般涌入深圳。国营、集体、个体、合资、独资等各种类型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从建设国商大厦“五天一层楼”到国际贸易中心大厦“三天一层楼”，“深圳速度”轰动全国。

没有资金，深圳人就勇闯政策法规的“盲区”，向外商搞土地有偿使用，利用国外投资和贷款搞“借鸡生蛋”；实行新的社会经济管理制度，打破“大锅饭”，搞承包制，赏罚分明。

正是凭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精神，深圳人闯出了经济特区发展的新路子，创造了腾飞式发展的新速度。

美国人惊叹：深圳是“一夜崛起之城”！



在成立经济特区之前，深圳只是一个小渔村；成立经济特区之后，深圳迅速崛起。

欧洲人称深圳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出现的令人感兴趣的新事物”！

然而，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对特区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特区的建设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商品匮乏的时候。电视机、录音机、计算器、优质布料都是紧俏商品。国门一开，特区全民经商，相应的防范措施跟不上，久已存在的走私贩私活动便因此更加严重，甚至于广东、福建的几个沿海渔港、渔镇很快就成了走私贩私的据点。

走私贩私活动严重破坏了特区的形象。

有人说：特区财政、外汇都不能自给，是在靠输血维持，针头一拔就会死。有人说：广东办特区，内地成灾区，赚的都是内地的钱。有人说：特区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典型。有人说：特区是国中之国，是社会主义中国的资本主义地区。甚至有人说：特区实际上就是“租界”。

一时间，“特区还办不办？”成了一个問題。特区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1982年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紧急通知》，提出严厉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行为。国务院各部委在不少文件上谈到相关问题时，也不忘专门加上一句：“广东、福建不例外。”

经中央批准，国务院组建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加强海上堵截和陆上检查，严格实行渔政管理，整顿走私严重地区的基层党政组织，依法惩办了几个罪大恶极的走私贩私分子，终于把这股走私贩私的

邪风压了下去。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始终关注着特区的命运。每当特区发展遇到困难，特别是受到“左”的思想干扰时，他总是反复强调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会变，经济特区的政策不会变，并鼓励特区建设思想要解放一些、胆子要大一些。

从1980年起，党中央和国务院每年都要召开专门会议，研究解决经济特区建设中遇到的问题，并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以确保经济特区在正确的轨道上健康快速发展。

1984年1月，邓小平亲自考察了深圳、珠海、厦门3个特区。当他登上国贸大厦22层的天台将远处香港的景色尽收眼底时，当他看到繁华兴旺的商业区时，当他看到渔民村的二层小洋楼和村民家中一应俱全的电器时，当他看到高速发展的电子企业时，向来惜字如金的邓小平对经济特区取得的成就感到满意，并为3个经济特区分别题词。

为深圳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为珠海的题词是：“珠海经济特区好。”

为厦门的题词是：“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这些题词，是对有关经济特区问题作出的权威性结论，是对经济特区作用与成效的充分肯定。

日新月异的经济特区对全国的辐射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越来越明显。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从南方到北方，从生



邓小平为深圳经济特区题词。

产领域到基础设施、商业、金融业、旅游业、信息产业等领域，经济特区的探索和实践都为其他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经济特区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模式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发展提供了借鉴。

名言金句

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邓小平

读党史 长智慧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重要抉择。党中央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于对人民群众的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邓小平同志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

如果说改革是对内的开放，那么开放便是对外的改革。“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创办经济特区是党中央实行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决策。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创办经济特区，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里找不到，列宁的著作里也找不到，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史无前例的伟大创造。

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的实践，探索出了一种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模式，为全国打造了一条从一般小城镇

走向区域性现代化中心城市的发展道路，进一步验证和丰富了邓小平理论，从而对中国人民迈向共同富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创办经济特区的实践说明：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的大势，抓住历史变革的时机，奋发有为，锐意进取，人类社会就能不断前进。

我们青少年应该像年轻的城市深圳一样，秉持“开拓创新、诚信守法、务实高效、团结奉献”的精神，始终保有活力与创新精神，成为勇立时代潮头的弄潮儿。

十、改革怎样推进到城市经济体制领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由小岗开启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迅速展开，改革率先在农村取得了突破。反观此时的城市改革，职工吃企业“大锅饭”、企业吃国家“大锅饭”以及企业管理僵化和效率低下等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城市改革自然成为下一步改革的方向。

1984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谈道：“过几天我们要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这将是一次很有特色的全会。前一次三中全会重点在农村改革，这一次三中全会则要转到城市改革，包括工业、商业和其他行业的改革，可以说是全面的改革。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其基本内容和基本经验都是开放，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更加开放。”

这次讲话不但向世界透露了中国即将召开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消息，而且再次明确了全会的重点是城市改革。

后来的实践证明：首先启动农村改革，以农村的改革和发展推动城市改革，又以城市的改革和发展支持农村，这是中国改革的成功之路。

打破“大锅饭”：拉开 企业改革帷幕

吃“大锅饭”是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和城市的普遍现象。其典型特征就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

坏一个样，干和不干一个样。

当时的企业大多是国有和集体的，而国有和集体的企业的管理制度就是吃“大锅饭”：工资按年头涨，福利按人头发。这导致几乎每个企业养着一大批闲人、懒人、庸人和散人。这些人成为企业的巨大包袱，而吃“大锅饭”的管理制度直接影响了生产者和管理者的积极性。

由小岗“大包干”催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举打破了中国农村的“大锅饭”，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产量屡创新高，农村经济专业化、商品化趋势显露端倪。

农村巨变推动着城市改革加快进程，形成了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

于是，有人提出城市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大锅饭”非得砸掉不可，否则就没有出路。很快，浙江省的海盐县出现了一位企业改革先锋——步鑫生。

1980年，出身裁缝世家、时年46岁的步鑫生出任浙江省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当时，海盐衬衫总厂是个只有300多名职工的小厂，由于管理机制僵化、管理手段落后、长期吃“大锅饭”，经济效益低下。厂里虽然年产四五十万件衬衣，却有近一半堆在仓库里，老工人的退休金无处可支，海盐衬衫总厂实际上已经处在破产的边缘。

刚刚上任的步鑫生被逼得走投无路，于是学习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敢为人先的精神，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在企业里探索推行一套独特的经营管理办法，并且一出手就是几大“板斧”：

第一，打破“大锅饭”，在车间实行“联产计酬制”。做多少衬衫，

就拿多少工资，上不封顶，下不保底。

第二，落实“责任制”，做坏一件衬衫要赔两件。为了确保和提升产品质量，步鑫生提出了“你砸我的牌子，我砸你的饭碗”的口号。这一口号风靡一时，广为流传。

第三，杜绝“泡病假”，规定请假不发工资。若真生病，要由步鑫生亲自来决定是否补



改革先锋——步鑫生

贴。这是因为“泡病假”在当时的国有和集体企业中，就像流行性感冒一样，非常普通，并且很难根治。即使在生产最繁忙的季节，企业的出勤率也只有 80% 左右，而真正生病的不到“泡病假”的 1/3。

第四，打响“品牌战”。步鑫生常说：“靠牌子吃饭可以传代，靠关系吃饭要倒台！”他亲自为衬衫定名，“唐人”是男式衬衣，“双燕”是女式衬衣，“三毛”是儿童衬衣。

第五，广邀“四海客”。海盐衬衫总厂每年开订货会，邀请全国各地百货商店的负责人到海盐来，吃住行全包。为此，海盐衬衫总厂每年要花 8000 多元，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

在步鑫生的带领下，海盐衬衫总厂职工 1983 年达到 600 多人，

两年后达 1000 多人，企业利润每年以 50% 的幅度增长，产品畅销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在企业改革的推动下，海盐衬衫总厂面貌焕然一新，



在步鑫生的领导下，海盐衬衫总厂发展迅速，一举成为一个产值超千万的企业。

一举成为海盐县第一个产值超千万的企业，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

1983 年 4 月 26 日，《浙江日报》刊登了报告文学《企业家的歌》，用整版篇幅介绍了步鑫生大胆创新、坚持改革的事迹。半年后，《人民日报》登载了《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的报道。一时间，步鑫生成了名扬全国的改革先锋，全国掀起了学习步鑫生改革创新精神的热潮。

2018 年 12 月 18 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步鑫生“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步鑫生还获评“城市集体企业改革的先行者”。

与小岗村 18 户农民代表按下“红手印”的“生死契约”一样，步鑫生用过的、被媒体称为“剪开企业改革帷幕”的裁布剪刀也被收入中国国家博物馆，成为历史见证。

保护个体户：“傻子瓜子”不能动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不断提高公有经济比重、减少私有经济比重的过程的话，

那么 1978 年以来的改革则改变了我国单一公有制的所有制结构，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全国劳动力就业矛盾非常突出。全国约有 1000 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陆续从农村回到了城市，需要安置；随着拨乱反正的推进，大批在平反冤假错案中落实政策的人员需要重新安置；在城市新成长起来的年轻劳动力也面临就业问题。政府、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不可能一下子满足这么多人的就业需求，本不富裕的国家财政越发显得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待业青年”犯罪的报道日益增多。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80 年 8 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要求改革劳动就业制度，提出“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发展生产，广开就业门路，实行政府统筹规划和指导下的劳动就业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

就这样，以解决就业问题为突破口，原来的单一公有制的所有制结构被逐步打破了。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大批回城知识青年开始通过在街头摆地摊、卖鞋帽、包饺子、卖馄饨、开修理铺等方式自谋职业。在短短两三年的时间里，个体经济发展迅速，摊位店铺如同雨后春笋一样在国内各个城镇的大街小巷冒出来。

个体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就需要雇工。随着雇工人数的增加和

个体户收入的不断增长，一场关于市场化改革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却愈演愈烈。

还是在安徽，一个名叫年广九的人成为这场争论的焦点人物。

年广九被称为“中国第一商贩”。他虽然没读过书，却有一手过硬的炒瓜子手艺。

改革开放前，年广九每天晚上七八点钟开始炒瓜子，一口气干到第二天早晨5点，洗洗脸，稍微睡一会儿后，7点钟左右又起来，开始把炒好的瓜子分成小包装好。等到下班时间，他就出去偷偷地卖。和别人不一样的是，年广九的瓜子味道香、个儿大、分量足，并且每包价格很低、利润很薄，同行因此都称他“傻子”。

改革开放后，随着政策上的放开，年广九炒瓜子的小作坊不断扩大规模，从1981年9月开始雇佣几个人到1983年初工人最多时



“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九

达 103 人，“傻子瓜子”红极一时。

随着大量个体户和民营经济的出现，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市场化改革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小小的瓜子暴露尖锐的问题，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而焦点就是雇工数量问题。

原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中举过一个有 8 名雇员的雇主是在剥削他人劳动的例子。据此，当时有人认为：只要个体户的雇工不超过 7 人，而且自己也从事劳动，就应当被视为“劳动者”；一旦雇工超过 7 个人，雇主就由个体户变成剥削劳动者剩余价值的“资本家”，就要对其采取限制措施。

“傻子瓜子”雇用 100 多人，远远超过了 8 人的界限，因此有人主张取缔。

有人分析了 1982 年“傻子瓜子”总收入后发现：“傻子瓜子”经营者并没有全部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年广九个人所得、雇工工资、上缴国家税费分别占总收入的 44.6%、12.1%、43.3%；年广九雇用的工人收入比国有企业职工收入要高得多。

还有人认为：年广九开办私营企业对社会不但没有什么坏处，而且有好处。因为在他的带动下，芜湖一下子涌现出近 60 家瓜子企业，瓜子销量达到 1500 万公斤，成为远近闻名的“瓜子城”。

这些争论传到邓小平那里，他在一次会议上明确指出：“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

放两年再看。”“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邓小平的明确表态及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出台，打消了人们对发展个体经济的顾虑，促进了多种经济成分的迅速发展。

扩大自主权：请给我们“松绑”

当时，人们把农业生产经营权集中在生产队长手里、农户无权的情况形象地比喻为“一个哨子”，把高度集权式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严重束缚企业手脚的现实比喻为“一条绳子”。

在这“一条绳子”的束缚下，企业工人吃的是“大锅饭”，端的是“铁饭碗”，工作好坏无所谓，干多干少一个样，反正是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生产积极性不高，缺乏效率，企业经济效益低下。

在农村改革率先改掉了“一个哨子”之后，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主要内容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逐步开展起来。早在1978年10月，四川省就确定成都灌县（今都江堰市）宁江机床厂等6家企业为改革试点企业。1981年，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在国有企业中全面开展。

同样是在1981年，国家又在山东省的企业中首先试行经济责任制改革，通过承包划分国家同企业之间、企业同职工之间的责、权、

利，进一步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然而，这些改革因未能触及企业独立的市场主体问题，政企不分、条块分割、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来管理经济、分配中严重的平均主义等问题仍然存在。

1984年，中国改革开放已进入第六个年头，但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们仍深感手脚被缚，处处施展不开，“盖个厕所都要十几个章”。旧有的计划管理体制严重束缚了企业的发展。

当年3月23日，福建省的55位厂长、经理齐聚福州，参加“福建省厂长经理研究会”。会上，厂长、经理们以“请给我们‘松绑’”为题联名给省领导写了一封信。

信中写道：我们认为放权不能只限于上层部门之间的权力转移，更重要的是要把权力落实到基层企业。为此，我们怀揣冒昧、大胆地向你们伸手要权，请给我们松绑，给我们必要的权力。

55位厂长、经理要求“松绑”的权力主要有3条：

一是人事权。企业干部管理除工厂正职领导由上级任命，副职领导由厂长提名、上级考核任命，其余干部通通由企业自行任免，上面不得干预。干部制度应破除“终身制”和“铁交椅”，实行职务浮动，做到能上能下。

二是财权。企业提取的奖励基金由企业自己支配使用，有关部门不得干涉。奖金随着利税增减而浮动，不封顶，不保底。企业内部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实行诸如浮动工资、浮动升级、职务补贴、岗位补贴等多种形式的工资制度和奖惩方法。

三是企业自营权。在完成国家计划指标的情况下，企业自己组织原材料所生产的产品，允许自销和开展协作。

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家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以集体的、有组织的方式开展争取权益、推进改革的行动。

4月24日，《福建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请给我们“松绑”》的呼吁信。这封信如一声春雷，在全国引起了震动。

呼吁信是我国企业改革史上企业经营者第一次吃“螃蟹”，是我国解放思想的一大成果，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吹响了号角。

与此同时，对外开放使人们大开眼界。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技术革命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也使经济体制改革变得更为迫切。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性商品经济”；突破把全民所有同国家机构直接经营企业混为一谈的传统观念，提出“所有权同经营权可以适当分开”。这是党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得出的全新认识。

邓小平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决定》出台后，推动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

——试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经营责任制、“工资与效益挂钩”等办法，几十年固定不变的“铁工资”逐渐松动；

——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厂长作为企业的法人代表，对企业负有全面责任；

——推进价格体制改革，放开了部分工业消费品和城市主要副食品价格，企业可以灵活定价；

——放宽投资审批权限，尝试取消贷款的指令性计划，企业的竞争力和做大做强的意愿更强了；

.....

与此同时，部分企业开始尝试进行股份制改革。

1984年7月，中国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率先迈出了股份制改革的步伐。

11月，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开始试行股份制，并向本厂职工和社会公开发行股票。两年后，当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访华时，邓小平把一张刚刚发行上市、面值50元的飞乐音响公司股票作为礼物赠送给他。这

张股票作为中国第一张比较规范的股票，被纽约证券交易所摆放在陈列室，供人参观。

1986年7月，中国第一家全国



深圳发展银行是我国第一家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商业银行。

性股份制金融企业——交通银行组建成立。

1987年12月，中国第一家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商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正式成立。

随着各项改革的陆续展开和推进，僵化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被冲破，我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农业改革和工业改革、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体制改革齐头并进，改革和发展相互促进的生动局面。

名言金句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

——习近平

读党史 长智慧

新时期的中国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在党的十二大以后全面展开。党的十二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是：全国改革的重点由农村逐步转向城市，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由试点到全面铺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整个国家焕发出勃勃生机。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党中央尊重群众愿望，积极支持试验，几年工夫家庭联产承包便在全国推行开来。与此同时，一些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开始进行：企业自主权逐步扩大，把一部分中央和省、自治区直属企业下放给城市管理，开始实行政企分开，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等。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有效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1978—1982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速达到7.3%，人民生活

水平的提升速度也超过以往任何时期。198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70元，城市职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00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100%和38%。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分两步走、在20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证明，只有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应变，主动求变，才能与时代共同进步。

今天，我们新时代的青少年要勇于进取，永不停步，不断给自己提出新的奋斗目标，勇敢担当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我们只有在担当中历练，在尽责中成长，才能让青春在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广阔天地中绽放光彩，让人生在实现中国梦的奋进追逐中实现应有的价值！



献礼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学好党史，才能传承红色基因。写给青少年，就是写给未来。建党百年前夕隆重推出的《写给青少年的党史》丛书，立意高远，特色鲜明，是党史普及教育的成功尝试。

——中国史学会会长、《求是》杂志社原社长 李 捷

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精选新时代青少年关注的60个重点、难点、热点、疑点、亮点问题，以鲜活语言、创新方式叙事明理，开辟出向青少年进行党史教育的新路径。

——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张启华

临近建党百年大庆，推出的这套以青少年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党史读本，选题重大，受众面广，解疑释惑，导向正确。该丛书是党史大众化、通俗化不可多得的力作，将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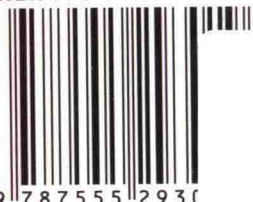
——原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黄修荣

该丛书主题鲜明，构思新颖，设计了60个对青少年来说容易产生模糊认识的党史重点、难点、热点问题，以问答形式展开论述，每个问题单独成篇，连贯起来构成一部中共简明党史。与以往那种按章、节、目来写党史的模式相比，这无疑是一种崭新的尝试。

——解放军原总后勤部干部轮训大队教授 曲跃厚

建议上架：青少年读物

ISBN 978-7-5552-9301-9



9 787555 2930

ISBN 978-7-5552-

定价：38.00元